

陕西师范大学

---

硕士学位论文

---

清代晋南地区镇问题研究

---

姓名：熊梅

---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

专业：历史地理学

---

指导教师：王社教

---

20070401

# 清代晋南地区镇问题研究

熊梅

**摘要** 本文旨在用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对清代晋南地区的镇进行实证研究，以期揭示清代黄土高原地区镇存在与发展规律的一个侧面，为当前山西镇的发展提供历史凭据。经研究，本文认为：

在我国古代，由于时空的演变，“镇”的地理表现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而“镇”并不专指商镇，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镇类型的划分可因标准不同而异，判定镇的职能当是研究的第一步。在具体操作中，拓展镇为经济型镇级中心地和非经济型镇聚落将有利于解决研究中的实际问题；在界定商镇属性时，应避免以点代面，以量变代替质变的倾向，鼓励加强镇与乡村关系的研究，这是实现镇研究新突破的重要途径。

清代晋南地区的村镇关系表现为：镇隶属于乡里，却又处处显示出优越性来。从镇的历史演变分析，镇来源于前代的军事关镇，或在普通的村庄堡寨基础上自发形成，即使存在部分由官方扶植而形成的镇也始终以村落固有的形式发展延续。然而，镇在人口和规模上却远远超过了普通村落，所承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功能奠定了镇乡土中央性的地位。简言之，镇虽囿于乡村的范畴，却实际为乡村聚落的中心地。

清代晋南的镇在类型上主要为单功能镇，也有部分多功能镇，而商贸性质的镇占主体；镇在地理分布上主要集中于谷地、河流两岸、驿路与孔道沿线，在空间分布上以蒲州府境内的镇分布密度为最大，而整个晋南地区内镇离县城距离的分布情况呈抛物线状态，其中，商业性质的镇密集于距县城 10-40 里的范围；到清代后期，晋南地区未见记载的镇有 12 个，新增加了 62 个，仍以商贸性质的镇和驿递性质的镇为主。

清代晋南地区的集会发展停滞不前，发育程度较低，集会的数量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集市内部各层次市场间的数量比例失调，州县集市数量偏多，集镇与村集数量有限；庙会以多、广、散的分布格局及具有较高频率的会期，对集镇，尤其是村集起了极大的替代作用；有清一代，晋南的集市发展徘徊不前，集会发展纠合并行，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集会发展形式，这与当地的自然、人文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清代 晋南地区 镇 集会

# On The Towns Of Jinnan In Qing Dynasty

XIONG Mei

**Abstract:** The main goal of the paper is to present the regularity of the exist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owns in Jinnan area in Qing Dynasty by studying the towns with the basic theory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expected to provide the historic geography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town construction as well. We dra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by research: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ime and space, the show of towns in geography were different and couldn't be regarded as only commercial towns in ancient history, which need to analyze the particular questions. To judge the functions of towns should be the first step in our research with the different standards. It's useful for resolving study difficulties to expand the towns as economic town-centers and noneconomic town-dwelling places. To judge the nature of commercial towns should be avoided two tendencies. The one is to do by generation of surface, and the other is quantitative changes instead of qualitative changes. We should emphasize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wns and the village, which will be an important way to make a breakthrough in the further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owns and the village of Jinnan in Qing Dynasty has showed that towns belonged to the village but existed superiorities. One hand towns came from garrison towns or ordinary village dwelling places, developing just as the village even depended on the government; The other hand towns were superior to the ordinary village at the population and the scale, moreover because of their too many functions, such as politics economy and military affairs. Towns were established to center authorities of the native soil. In a word, although towns were limited to the village, in fact, they were the key places among the villages.

Towns of Jinnan were mainly divided into single function towns and small amount multifunction ones in Qing Dynasty, which were composed of the major commercial towns. Lots of towns lay at valleys and riversides and convenient communications, which were mostly distributed in PuZhouFu. The distance situation from towns to the cities showed a curve distribution and the commercial towns were concentrated between ten miles to forty miles. There were twelve towns hadn't been recorded but sixty-two were new numbers of Jinnan in late Qing Dynasty, which were mainly consisted of

commercial towns and post towns.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markets of Jinnan were bogged down and grew worse in Qing Dynasty. As the quantity of county fairs fell, that of the temple fairs would rise. The inner markets lost balance, more city markets but less commercial towns and village markets. A great deal of temple fairs distributed widely had frequent market days, that greatly instead of commercial towns and especially village markets. The unique development that commercial markets stagnated and county fairs entangled and involved temple fairs was deeply related to local natural and humanities environment.

**Key words:** Qing Dynasty Jinnan Area Towns Commerical Markets



# 第一章 前言

## 一、选题意义

第一，在清代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市镇经济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然而，在我国古代，镇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就其职能而言，可以大致分为行政镇、军镇、驿镇、商镇、混合镇（或称多功能镇）等，而市镇仅是商镇的一种。由于镇类型的多样化，所以它并不专指经济实体，因而在文献的收集整理中，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地将所有以镇命名的聚落都笼统地视为市镇。长期以来，市镇经济的研究一直是大多数学者关注的焦点，而其它商镇或别的类型镇的研究还显得相当薄弱，这种学术格局显然不利于系统的掌握和揭示我国古代镇的发展规律。因此，对不同类型的镇从不同视角、以不同方法进行细致入微的方方面面考察，是扩大研究面和提高研究水平的途径之一。

第二，当前，学术界对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江南市镇这一热门话题上，华北、西北等其它地区镇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迄今为止鲜有学者将晋南镇的研究作为一个特定的对象，从整体上予以把握。这表明，清代晋南镇的研究领域仍有很大的发掘空间，应该在吸纳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踏实的研究，将黄土高原的一个缩影——晋南镇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从而推动该学科的发展。

第三，当前，加快小城镇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如何使其健康发展是中国学者必须思考的问题之一。通过对清代晋南镇的研究，努力为当代我国山西乃至整个黄土高原小城镇的建设提供可资参考的历史资源，对同样具有复杂特征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作用，使历史地理的研究做到有益于世。

## 二、研究现状

目前，学术界对于清代镇的研究逐渐深入，有关市镇经济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任放的《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就是一部力作，其中《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堪称一篇全面的综述；另外，与城镇相关的论著也是比比皆是，多体现在城市史、城市地理和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中。颜晓红、方致远《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明清城镇及城乡商品经济研究的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4期）一文同样反映了学者对清代镇的研究

仍多从城市的角度来探讨城市化或城镇化的问题。可以看出,有关清代镇的研究密集于单一的市镇经济,研究范围重点还在江南地区、长江流域及珠江三角洲。这样,镇的其它类型的研究被长期忽视,进而导致了区域研究的不平衡;另一方面,形成范式的城镇化研究过多地强调了镇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使得镇在历史时期乡村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致使出现了基层社会研究与城市史、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各为其主的局面,极不利于学术研究的融会贯通。近年来,随着学科发展的趋势,北方乡镇基层社会经济的研究被提上了日程,例如刘景纯对黄土高原城镇地理(《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中华书局,2005年)的探索张萍对陕北集镇(《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明清陕西区域市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6年)的研究,都为该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此外,龚关《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集期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张青瑶、王社教《清代中后期太原盆地镇的类型及形成因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张青瑶《清代太原盆地镇的发展与周边地域社会经济关系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4年)以及马玉山《明清时期山西市镇的布局与类型》(《历史地理》,第12辑)、行龙、张万寿《近代山西集市数量、分布及其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等论著也为清代该区域的研究带来了启发。然而,我国北方地区面积广阔,值得挖掘和深入探讨的区域还有很多,因此,本文选定黄土高原具有代表性的晋南盆地,拟对清代该区镇的发展加以深入研究,以期丰富历史时期镇研究的多样化,为消除区域研究的不平衡贡献绵薄之力。

### 三、研究对象

本文讨论的历史时段为清代;本文所讨论的晋南是指当前山西的临汾和运城两个区域,在清代中后期来说,大体包括两府一州四直隶州二十九县(以《清史稿·地理志·山西》为准),它们分别是平阳府(临汾、洪洞、浮山、岳阳、曲沃、翼城、太平、襄陵、汾西、乡宁、吉州)、蒲州府(永济、临晋、虞乡、荣河、猗氏、万泉)、解州直隶州(安邑、夏、平陆、芮城)、绛州直隶州(垣曲、闻喜、绛、稷山、河津)、隰州直隶州(大宁、蒲、永和)、霍州直隶州(赵城,灵石<sup>①</sup>);本文所讨论的镇是指方志中明确以镇命名的聚落,其中涉及集镇研究,考虑到其它商品交换的场所,如村集、庙会等,与集镇一样实际发挥着乡村聚落经济中心地的作用,为更好地探讨清代晋南集镇的地位,特扩展为集会研究。

① 按《山西省志》,清代霍州直隶州之灵石县不属于今晋南地区,但为了保证区域研究的完整性,故仍将其列入本文讨论的范围。

## 四、研究思路

本文以清代晋南盆地为例，探讨该区域内与“镇”相关的四个问题。首先，对当前“镇”研究中存在的认识偏差进行辨识，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作基础；其次，从方志记载的思想入手，探讨清代该区域内镇同乡村的关系，确定其属性；再次，选取史籍（主要为地方志）记载中明确以“镇”命名的聚落，分析其职能、分布、发展情况，初步得出清代晋南镇组成状况；最后，认真整理和统计出晋南的集会，从场址数与集日数两个层次分析出集会之间及集市内部不同层级市场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不同时段集会数量的考察，总结出清代晋南集会的历史发展规律，为当前的小城镇建设提供参考。

## 五、研究目的

通过具体分析清代晋南的村镇关系、镇本身的构成、集镇同其它经济中心地之间的关系，力图了解该区镇的发展状况和演变规律，尤其关注集镇与其它集会在数量上的比例，从而发现晋南历史时期乡镇发展与市场组成的地域特点，为黄土高原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相关的历史依据。

## 第二章 基于当前“镇”研究的思考

本文在前言部分已经阐述了当前学术界关于“镇”研究的现状，对“镇”本身的认识偏差和在实际操作中的研究误区或许是导致其研究产生局限性的一个客观因素。鉴于此，本章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对镇的时空演变、镇类型与镇研究、商镇属性的争论三个问题谈点粗浅认识，为后文的实证研究作基础。

### 第一节 镇的时空演变

提到镇，大多数学者认为始于后魏。从古汉语的角度来看，它有压、抑制、安定、用武力据守等含义，又或指镇守的地方、险要之地、屯营之处等。可见，它的起源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这种原始的“镇”实质是朝廷在边塞屯军治县的所在地，往往派有重兵驻守，这与作为要冲之地的军事地位密不可分。从隋唐沿袭其制推想这种军镇应该是适合当时的统治需要。至唐末五代时期，节度使在其辖区内大量设镇，史称藩镇或方镇。所设的镇使、镇将等武职官员不仅可以向人民征收器甲粮饷，还负责管理和防御等事务，实际上集行政、军事大权于一身。较之后魏而言，其军事重镇的色彩更加浓厚。

北宋开国后，宋太祖接受唐末五代时期各地藩镇割据、不利于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教训，于建隆三年十二月癸巳诏置县尉，削夺镇将干涉地方政权，同时裁撤、罢免节度使、镇将、镇使，撤销了大量作为军事据点的镇。于是，“诸镇省罢略尽，所以存者特曰监镇，主烟火兼征商”<sup>①</sup>。这种“监镇”被朝廷确认为行政建制之一，并且将诸镇监官的职权限定在“掌警逻盗窃及烟火之禁，兼征税榷酤，则掌其出纳会计”的范围内<sup>②</sup>，这样，唐末盛行的军镇在宋初遭到了极大的挫折，所保留下来的镇大多处于交通要冲和商业、手工业发达的地区。至此，由后魏兴起的镇发展到宋代经历了此番波折后，其军事色彩大为降低，虽然仍有少量部分军事意义的镇，但那些以人口众多、交通条件与经济基础较好的原因幸存下来的镇逐渐发展为乡村商品经济活动的中心枢纽。从宋代开始，镇的经济意味开始突显。

到明清时期，镇在地理表现上的差异性更为突出，人们对镇的理解又有不一样的看法。在江南地区，“人烟辏集之处谓之市镇”<sup>③</sup>，或指“商贾集聚之处，今皆称为市镇”<sup>④</sup>。可以看出，“市”与“镇”在江南地区已经合称并成为镇的类型

① 嘉泰《吴兴志》卷8《公廨》。

② 《宋会要辑稿》48之92《职官》。

③ 弘治《吴江县志》卷2《市镇》。

④ 弘治《湖州府志》卷之4《市镇》。

之一，指人口集中、商品流通繁盛的地方。至清代，方志曰：“贸易之所曰市，市之至大者曰镇”<sup>①</sup>。从此史料可以看出江南地区的“镇”因为“市”的繁华而成为了“巨市”的代称，该地“镇”的经济意味无疑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近年来，随着江南市镇研究的升温，所言必称市镇，似乎给人以错觉，认为江南地区镇的类型只有市镇一种。其实不然，从一些方志的记载不但可以看出江南地区军镇到市镇的演化，也能证实该地区其它类型镇的存在。例如“县必立市，市大者曰镇。古来镇将居守之（地），后为商贾之区，遂以为名也”<sup>②</sup>；“人民屯聚之所谓之村，有商贾贸易者谓之市，设官将禁防者谓之镇”<sup>③</sup>。在北方地区，很多方志中都没有“市镇”的专项设计，镇通常被记入“堡寨”、“镇堡”或“乡镇”条下，似乎在撰写人头脑中堡寨与镇的联系更加密切，犹如江南市与镇的关系，很简单，它们因某种相似的特征被安排在同一子目录下，这种特征便是军事防御。在明代的北方地区，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设立了许多有名的城镇以加强国家对地方，包括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即使后来堡寨的性质逐渐演变而具有了经济的功能，从堡寨演变为镇的为数仍是不少。因此，北方地区称镇的地方可能多为地理要冲之地，也可能指居民辐辏的地方，如陕西洛川县“居民零星散处，或十余家为一村，或三五十家为一堡，多至百余家为一镇”<sup>④</sup>，甚至还有认为镇是“民聚不成县而有课税者”<sup>⑤</sup>，或“为行旅息肩商贾贸易之所”<sup>⑥</sup>。

不难看出，人们对镇的认识和概括历代有所不同。由于时空的演变，“镇”的地理表现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区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认为镇只同市一样，“是指具有一定的地域，聚集着以离开农业生产主要从事于手工业、商业及其他职业的居民集居点，是一个经济的实体”<sup>⑦</sup>的看法有失全面，而“市与镇在唐代以前是有区别。一般地说市是指商贾聚集之所，镇是专指军事设防之地，而明朝的市与镇已无区别”<sup>⑧</sup>的结论似乎也未免妥当。如果仅将“市”与“镇”等同划一，认为“市和镇作为地理概念和地理实体，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市，是由农村交换剩余产品而形成的定期集市演变而来；镇，是比市高一级的经济中心地”<sup>⑨</sup>，从而过于倚重镇的商业性质，只看到其经济职能的一个方面而忽略其它部分的做法，势必会导致镇内涵的缩小与概念的缺失，进而影响到镇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① 康熙《嘉定县志》卷1《市镇》。

② 乾隆《白水县志》卷2《市镇》。

③ 语出嘉靖《江阴县志》，参见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

④ 嘉庆《洛川县志》卷1。

⑤ 乾隆《蒲县志》卷2《建置·乡镇》。

⑥ 光绪《吉州全志》卷1《镇堡》。

⑦ 陈学文：《古代江南发达地区嘉兴市镇经济及其结构的探索》，《探索》1986年第4期。

⑧ 陈学文：《略论明中叶市镇经济的发展》，《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⑨ 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年1月号。

因此，在实际研究中要尽力顾全镇时空演变的真实情况，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镇的资料收集应有充分的掌握。

## 第二节 镇类型与镇研究

任何事物一旦产生理论概括就容易使人忽略事物内部之间的性质差异而只从总体概念上去接受这一事物，镇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眼睛只锁定这一个字，就会把它看成千篇一律的东西而忽略它们的个性和特点。因此，对镇研究的第一步当是对其做定性的分析，即对不同的镇进行分类。

镇类型的划分，可因标准不同而异。就历史沿革而言，镇大体上可分为“湮灭型”、“新生型”、“新旧交替型”三种类型。就地理环境而言，镇大体上可分为“流域型镇”、“内陆型镇”、“山区型镇”、“边际型镇”四种<sup>①</sup>。就镇的人口来划分：一是部分巨镇、大镇，人口在上千户至数千户；二是一般性镇，人口在数百户左右；三是小规模镇，人口为百余户<sup>②</sup>。就功、划分可归为六类：（关）军镇、驿镇、商镇、驿镇商镇、关镇商镇、关镇驿镇<sup>③</sup>。就行政属性而言大体可分为“自然镇”和“建制镇”。无论哪种标准，搞清楚镇的职能当是关键，这是对镇进行深入研究的前提，倘使对其置之不理而一概论之，势必混淆是非得出不可靠的结论。何荣昌曾举清康熙初年江阴县“分全县十七乡三十六镇，镇各领堡”这一史料，论曰：“这种变化反映着商业的发达和市镇的兴起”<sup>④</sup>。很明显，这是用“市镇”偷换了原始材料中的“镇”，由于忽略了镇的类型划分，得出的结论势必打问号。普遍认为，明清江南的镇绝大多数已经脱离了它原始的含义，从军镇转化为市镇，然而是否每一个镇都是标准意义上的市镇还值得怀疑，据龙登高研究，宋元明清的江南地区因军事战略而设置并因军事需求而成长的军镇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主要类型之一<sup>⑤</sup>。况且，即使市镇这一类型在明清江南已是完全普及，也只能代表该地域的大体趋势，其它区域的状况未必如此，张青瑶、王社教的研究表明，即使到了清代中后期，西北“太原盆地内具有市镇性质的镇约占总数的2/3，其余尚有非市镇性质1/3份额的镇存在”，“从而，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地将所有以镇命名的聚落都笼统地视为市镇”。从历史事实出发，有必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的分析，决不能以点代面含混其辞。

就镇的职能而言，尚可以补充为以下五种：为府、县政区治所或派出有政府

① 参考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类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② 参考陈国灿：《南宋太湖流域市镇的人口规模与居民结构》，《许昌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③ 张青瑶、王社教：《清代中后期太原盆地镇的类型及形成因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④ 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⑤ 龙登高：《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8页。

机构、主要体现政治性职能的行政镇；位于地理要冲并驻扎有相应数量的官兵、以镇守为主要职能的军镇；位于孔道网络之中、以为官方交流服务（接待官员往来、传达信息、递送物资等）为主要职能的驿镇；位于便利的交通位置，以商品流通为主要职能的商镇<sup>①</sup>；上述多种职能并重谓之混合镇，也可以称为多功能镇，在历史长河中随着镇的不断演进，其功能往往越来越多地融合为一体。在某一特定的时期，镇的某种功能突显到完全能够代表该镇的特征时，我们以它的这种显著特征作为该镇区别于它镇的标准。换言之，当镇的两种或多种功能并驾齐驱同时成为该镇的总体态势时，我们则视其为混合镇。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各类型的镇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类型镇之间往往会发生相互的转化或在职能上彼此兼容。因此，在综合评定镇的职能类型时，决不能单凭其中的一个因素急躁地作出判断，这样将会产生与事实不符的情况。另外，还要注意那些已经与一般乡村毫无差别但仍保留旧有名称的地名镇。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它们由于已经丧失了原有的功能演化为普通的乡村聚落，本不当列入镇的类型中进行讨论，然而在实际的研究中往往缺乏详实的史料对其进行逐一判别，故难免会有“无异村落”的地名镇混入到镇目之中，因此，在资料收集和整理时应该尽量将之排斥于外。

我们在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中还会明显地发现镇在古文献中的记载是不一样的，甚而有些没有出现镇的词缀，实际上也达到了镇一级的规模。有些集、市，可能已经发展为商镇或同商镇一样起到了乡村聚落经济中心的作用，但仍袭用原名。“由于店铺经营规模有大小，商贾交易额及其在整个市场成交额中的比重等数据无法获得，墟集转化为市镇的数量界限，也就无法从店铺数和成交额的计量来确定，墟集与市镇遂难以分清。因此，我们不能拘泥于文献资料中的称谓，对墟集转化为市镇的情况，应有充分估计”<sup>②</sup>。鉴于此，不妨考虑拓展“镇”的外延，将那些有可能转变为镇或同镇起着相同作用的地理实体同时纳入到镇的范畴中来。为进一步理清脉络，可将其分为两大版块——经济型镇级中心地和非经济型镇聚落。经济型镇级中心地包括商镇、村集或村市乃至庙会等，凡是起到乡村聚落经济中心作用的地理实体都应该设法考虑进来；非经济型镇聚落包括除了商镇以外的其它类型的镇，地名镇也应该属于这个范畴。这样一来，不但可以追溯商镇的历史演变同时也能更全面地揭示乡村聚落经济中心地之间的关系；另外，除

① 笔者认为，商镇包括了江南地区的市镇和北方地区的集镇。据《中国大百科全书·人文地理学》对“集镇”的定义，是介于乡村与都市之间的过渡居民区，它的性质既不同于纯农业活动的乡村，也有别于纯商业活动的都市。就目前对市镇的研究来看，集镇同市镇在性质上是一致的，从商品交换的角度看，集镇和市镇实为同一含义。然而在我国北方内陆地区，相当数量集镇的经济水平和规模与江南不可同日而语，为便于不同区域商镇研究的开展，暂将商镇从地域上分为市镇和集镇两种。

② 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

商镇以外其它类型镇长期被忽略的问题也可以得到重视。上述两大板块的设想可能还存在考虑欠妥的地方，但可以尝试去解决研究中的一些实际问题，不当之处尚可以做进一步的推敲。

当前，学术界对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江南市镇这一热门话题上，华北、西北等其它地区镇的研究还相当薄弱，这固然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因素，同时也与研究视角和方法有关。其实，对我国历史时期镇的研究应该从类型入手，进行分类研究。对不同类型的镇从不同视角、以不同方法进行细致入微的方方面面考察，也许是扩大研究面和提高研究水平的途径之一，遗憾的却是当前研究中不被重视的一个环节。

### 第三节 商镇属性的争论

我国历史上的府州县城属于城市似乎长久以来并无多大争议，但是，明清的商镇，尤其是学术界为之关注的市镇，是否属于城市的范畴则一直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商镇属于城市或等同于城市，如陈学文认为：“江南市镇是作为城市体系中一个群体而存在的，研究它的意义并不次于研究大城市”，“市镇是属于城市体系的，到了明清时期的城市除了京都、省会、府城、县城作为各级政权所在地的政治职能外（但仍有经济职能），许多市镇则更多的是经济职能在发挥作用，即市镇是经济性的市场网络，是大大小小的经济交流中心”<sup>①</sup>；李学勤、许吉军认为：“城市、市镇是完全脱离或部分脱离农业、以从事工商业活动为主体的，并拥有一定的地域的，非农业人口相对集中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实体”<sup>②</sup>；王卫平则直接将江南市镇称作“新型经济城市”<sup>③</sup>；陈国灿、奚建华认为明清时期浙江的市镇“与一般城市没有多大区别，实际上可以说发展成为一个个小型城市”<sup>④</sup>。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市镇有别于城市，并倾向于乡村一说。王家范认为：“在估定明清江南市镇的历史价值时，有些论者倾向于认为市镇与以往的消费城市在性质上无多大差异。我认为，这种看法至少对明清江南市镇是不公正的，因为它忽略了江南市镇与农村的纵深联系，从而对这种市镇与城市相异的新的经济特征注意不够。”“其实，从形成途径说，市镇和城市是很不相同的。城市（都市）是由于政权的力量，政治上的原因，由上而下形成的，消费对象主要为贵族阶级；市镇则主要由于经济的原因，即乡村与商品经济的联系的扩大，由下而上相成。固然市镇的消费对象中地主阶级仍占相当比重，但市镇必须与其四周的乡村发生虽

① 陈学文：《明清时期湖州府市镇经济的发展》，《浙江学刊》1989年第4期。

② 李学勤、许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957页。

③ 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97、156页。

④ 陈国灿、奚建华：《浙江古代城镇史》，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5页。

然往往是零星的、小额的，但总量却很不小的交易。因此，市镇的形成，不是以府县城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而却往往在离府县城比较远、与邻府县交界的地区率先出现，这就说明市镇的产生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需要有着极密切的关系。”“明清江南市镇与乡村的亲缘关系，还可以从市镇的格局上得到印证”<sup>①</sup>；包伟民也认同“市镇本是在政治都邑之外由于专业经济的发展自然形成的，在性质上与州县都邑有很大差异”<sup>②</sup>；赵冈认为：“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化过程并非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特例。不错，各国历史上都出现过许多小型的市镇（MARKETWON）。但是，这只是城市化的过度阶段。市镇所能完成的功能与任务，大中型城市也都可以完成，而后者却具有更多的规模经济，所以小市镇逐渐转变发展成大中型城市，而市镇在整个城市人口中的比重愈来愈小。但是中国明清时期的市镇不像是一个过度阶段，而市镇人口的比重也愈来愈大。”“在其他国家中，城市人口比重愈来愈高，也愈来愈集中，小城市变大，大城市变得更大。但是在中国，宋代以及城市人口出现一种离心现象，集中的程度减弱，大中型城郡停止扩充，而市镇的数目大量增加，整个的城市人口愈来愈向农村靠拢”<sup>③</sup>。

不得不承认，明清江南市镇的确是“城乡原料作物的加工中心与技术处理中心”，是“乡村农副产品与手工业商品的贸易市场”，是“介于大中城市与广大乡村之间的联结的中介”<sup>④</sup>，这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下明清江南市镇产生的社会功效。对此，学者早已达成了基本的共识，然而市（集）镇与城市仍然有着的本质区别。首先，市（集）镇的兴起和发展与城市相比不仅方向相逆，而且在我国古代，似乎市（集）镇以强大的经济功能著称，而城市的政治意味浓过于经济职能。从此角度考虑，市（集）镇与城市所发挥的主要作用和功效当不一致。另外，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设有政府机构并有官员任职，但这不是市（集）镇形成的必要充分条件，换句话说，市（集）镇并不一定具有政府机构和任职的官员。当然，在界定商镇属性时也不决应该无限的放大市（集）镇与城市的这种差别，仍需视其具体问题进行分析。

历史时期我国的商镇究竟属于何种范畴，仁者见仁，各有合理的部分，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見。分歧的起因大致并非在于对社会变迁衡量标准取舍的不同，而是各自基于归纳的个案和角度的差异，或者说是由于基础性的个案研究工作尚不

① 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对此观点需要声明，在我国历史上，城市的形成应当不全是“由于政权的力量，政治上的原因”，部分城市同市镇一样，也有一个自然的、历史的发展过程，但很多时候这两个因素常常纠葛在一起导致城市发展的复杂性，而政治上的原因则起了主导作用。

② 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 1840-1949》，北京：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16页。

③ 赵冈：《论中国历史上的市镇》，《中国社会经济研究史》1992年第2期。

④ 陈学文：《明清时期湖州府市镇经济的发展》，《浙江学刊》1989年第4期。

充分而致。就明清商镇而言，研究江南市镇的学者较多的偏向将其定位于城市体系之中，姑且不论孰是孰非，就界定中出现的两种倾向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是过于强调市镇的经济地位，仅以市场发育程度作为判断的唯一标准。龙登高认为：宋元明清市镇的兴起，在发展模式上是多元化的——集镇型（由集市所在地演进而来，是村落交易培育的乡村中心地）、商道型（因地处交通要道而成长起来）、专业市镇型（以地方特色性商品生产而发展）等。只有集镇型市镇才是农村市场“土生土长”的（对此看法笔者持保留意见）。从规模而言，集镇型市镇有其限度，商道型市镇、专业市镇才更具广阔空间。市镇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市场联系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才能在互动的优化配置中实现经济总量的大增。可以看到，商道型市镇以其地理位置而联系广大的市场，专业型市镇则以其产品联系区域和全国市场，不断成长起来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兴盛就是如此<sup>①</sup>。通过对集镇型市镇与商道型市镇、专业型市镇市场范围大小的比较，龙登高认为明清江南市镇作为工商业中心的中小城市更为突出，而作为农村经济中心的乡村性则相对弱化。这里存在疑问，凡是具备强大经济功能、拥有较大市场范围的地理实体就是城市吗？只要有商道型市镇、专业型市镇（而忽略集镇型市镇的多寡）的区域其乡村性就会弱化吗？若硬将市场作为判断商镇所属的唯一指标，我国古代商镇的市场总体情况仍与城市存在差异，正如郭正忠所言：“唐宋以后涌现的工商业镇市，在外部形态、居民成分、管理体制乃至其生产、流通、消费等内部结构方面，有别于一般郡县城市”<sup>②</sup>。因此，我们不能仅用市场大小和商业程度的指标来判断商镇的所属，不能单用特殊性取代普遍性来总结事物发展的规律。

二是忽略或压缩了城市有别于市镇的其它职能，仅从市镇的大小多寡裁决其量变与质变的转化。李伯重在《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中曾专节讨论了明清苏州市镇的定位，作者承认从居民的数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比率、人口密度和居民点之间的距离等等标准来判断江南市镇是否为城市确实很困难<sup>③</sup>。在书中，作者用最普遍意义上的“城市”的概念（乃是一个比村子大的居民点，并有很多房子、商店、工作场所、娱乐场所和宗教场所）以及市镇承担的功能、发展趋势等方面将苏州地区的市镇定位为城市。李伯重认为江南市镇承担了城市的一般职能（或基本职能）中的大多数，即每一城市都必备的那部分城市职能，如为本城居民服务的商业、服务业、建筑业、食品加工业等职能，以及保障城市居民安定和城市运营正常进行的那些职能（如公用事业、行政机关等）。明清江南

① 龙登高：《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5、68页。

② 郭正忠：《中国古代城市经济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85年7月24日。

③ 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85—391页。

以强大经济功能为显著特点的市镇似乎与同一时期主要体现政治功能的城市相比，似乎承担的只是城市一般功能的一个方面；至于发展趋势，诚如大多学者的研究，明清江南市镇的发展的确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但变大变多以后是不是就转变到城市了呢？范毅军认为：“明清江南地区城镇化的基本性质，乃是市镇的广泛性成长（extensive growth）更甚于集约性成长（intensive growth）。也就是说，只见许多大大小小的市镇在明中叶以来的江南地区此起彼落，市镇总数的数量越来越多，然而个别市镇在本身持续发展过程中所累积的社会经济实力，以及对于促进传统江南社会经济结构产生突破性的转化，其助益恐怕是相当的有限的”<sup>①</sup>。而且，“从总体上看，我国封建社会的制度结构和各项制度安排以及非正式制度因素均不利于市场机制的发育成长，成为抑制甚至扼杀市场经济的桎梏。在他们共同作用下，乡镇工商业发展得不到激励，商品经济受到抑制，既难以催生出工业化的诱因，也不可能形成独立的产业基础和新的社会阶层。中国的传统乡镇不能摆脱对农业经济高度的依赖性，始终难以从乡村系统中分离出来。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进程中，我国传统乡镇基本只有数量上的增减而不可能发生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不可能完成由传统型乡村集镇向近现代工商业城镇的转型。这与西欧国家的城镇发展过程形成鲜明的对照”<sup>②</sup>。在这一点上，邹兵与范毅军是不谋而合的。确实，商镇本是介于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枢纽，具有发展为城市的可能，但并不是所有的商镇都能发展为城市，这种转变是需要具备很多条件的。假设李伯重所讨论的苏州市镇属于城市范畴，那么我国历史上商镇转为城市的机率有多高呢？在江南地区来说不见得普及，何况于全国而言，且它们是否真的完成了转变？应该承认我国古代的商镇发展不同于今日之城镇，更不同于国外的发展路线，绝大多数商镇的宿命没有归结于城市。更准确地说，我国的城市化走的是一条独特的市镇化道路<sup>③</sup>。因此，在综合判定商镇属性之际，切忌以个别市镇在某一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来衡量我国古代商镇的总体水平，也不当以局部地域内商镇的发展趋势来替代整个历史时期全国范围内商镇的性质和归属。

其实，商镇孕育于我国乡村这一广大的基胎并主要为之服务，成为农副产品、手工业品及日常生活用品的交换市场，是乡村农副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是乡村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产物。不管是北方的集镇还是江南发达的市镇，它们都是乡民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乡村经济的联系密切相关。据傅宗文研究，在商镇的初期“乡间草市镇的手艺生产，与农业关系密切。

① 范毅军：《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2年第3期。

② 邹兵：《小城镇的制度变迁与政策分析》，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第60页。

③ 王瑞成：《近世转型时期的城市化——中国城市史学基本问题初探》，《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年荒时歉，农民逋逃，购买力萎缩，市场随之衰弊”，可见其“对农业生产的依赖性还十分突出”<sup>①</sup>；王家范还认为：“如果深入到内部经济结构去分析，江南许多市镇之所以在明中叶之后会呈勃兴之势，完全是由于其四乡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推动”<sup>②</sup>；樊树志经过数十年的研究仍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四乡的支撑，市镇经济断然难以为继”<sup>③</sup>。因此，“江南市镇是在农家经营商品化、农业经济商品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市镇的生存和发展土壤在四乡的农村”<sup>④</sup>。至明清时期江南市镇仍与乡村保持着子与母的关系，更不用说那些欠发达的地区。尽管商镇也具有与普通乡村聚落相异的特点，但它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与乡村息息相关，可以说是乡村社会诸问题的集中指示器。我国传统乡村社会在生活方式、人口结构、文化变迁、政治沿革等各个方面，都可以从商镇的变迁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了解。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不仅应该加大城镇化问题的讨论，还应该加强它与乡村关系的探索，这将是实现镇研究新突破的重要途径。从各类型镇的演变出发探索我国古代经济社会问题决不是一场关乎商镇性质的拔河比赛，并不意味着城市史的研究就要将之排斥于外，相反，正是由于其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与城市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倒是在那些比较自由的中小镇市中，蕴蓄着商品生产的蓬勃生机，不断产生着崭新的经济因素”<sup>⑤</sup>。所以，从经济史的角度来说，城市史的研究更应该重视并加强对镇的耙梳和分析。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镇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由于类型的多样化所以并不专指经济实体，在研究中应该避免不顾事实盲目分析的行为；其次，长期以来江南市镇的研究一直是大多数学者关注的焦点，而其它区域商镇或其它类型镇的研究还显得相当薄弱，这种学术格局显然不利于系统的掌握和揭示我国古代镇的发展规律。鉴于此，当更多的加强薄弱环节的攻坚，自觉减少我国古代镇研究中的不平衡性；最后，在研究视角上提倡加强镇与乡村关系的研究，不盲从哪种已有的研究模式或套路，鼓励以更开阔的思维实现镇研究的新突破。

---

① 傅宗文：《宋代的草市镇》，《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

② 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③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2页。

④ 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7页。

⑤ 郭正忠：《城郭·市场·中小城镇》，《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 第三章 清代晋南地区的村镇关系

在当前学术界中,中国近代以来的城镇关系、城镇化问题俨然是城市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对此,国内外学者用力颇多,其研究成果不断更进。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从事我国古代史研究的学者也期望通过对文献的搜集与整理,实现对历史时期城镇问题的探索,这种研究思路和视角无疑对拓宽与深化我国古代史研究有积极的帮助,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忽略历史事实,用片面的眼光看待城镇问题的认识偏差。由于对我国古代“镇”的共性缺乏较为妥切的理解,在实际研究中极易套用固定模式将其与“城市”顺理成章的合而一谈。诚然,“镇”在乡村与城市的衔接中必然担当着过渡的中介作用,从研究的角度讲,完全可以由城镇入手,但丝毫不考虑古代村镇关系而盲目的将我国古代“镇”列入城市范畴的做法<sup>①</sup>,不仅将忽略村镇间血肉关系的历史事实,还可能对我国历史时期“镇”的地位与作用做出有失公允的判断。鉴于此,本章以清代晋南地区为例,从“镇”的记载方式、本身的历史演变以及村镇比较三方面来讨论历史时期我国北方地区的村镇关系,以期对古代“镇”做适宜的定位,夯实古代城镇研究的基础。

#### 第一节 “镇”记载的统一思想

在清代,坊里制是我国实行的行政管理方式,其主要思想为“在城曰坊,附城曰厢,乡都曰里”<sup>②</sup>。在农村法定社区,县以下常设乡、都、保、庄四级基层管理组织。因地域不同,有的为乡、都、庄三级,有的为乡、庄两级,还有的直达乡、里、村、社一级行政管理组织。在晋南农村,多数县实行乡、里、村三级行政序列。很显然,“镇”没有被列入行政建置之中。“按宋制,民聚不成县而有课税者则为镇”<sup>③</sup>,或“镇市为行旅息肩商贾贸易之所”<sup>④</sup>,无论怎样,“凡建县必有城,去城稍远则有镇”<sup>⑤</sup>,可以看出,“镇”在清代晋南地区,其规模和人口与县城相比有很大的差别,却同样可以成为供商品交换的市场。从地域上讲,“镇”不似“坊”、“厢”位于城内或城边,离城有一定远的距离,应该在乡里的地理范围

① 一些学者认为历史时期的“镇”属于城市体系,如:陈学文:《明清时期湖州府市镇经济的发展》,《浙江学刊》,1989年第4期;李学勤、许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957页;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85—391页。

② 光绪《虞乡县志》卷2《建置·坊里》。

③ 乾隆《蒲县志》卷2《建置·乡镇》。

④ 光绪《吉州全志》卷1《镇堡》。

⑤ 乾隆《乡宁县志》卷3《城镇》。

之中。那么，“镇”同乡村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从方志记载来看，清代晋南地区的“镇”常被列入以下几种条目中，具体见表 3-1：

表 3-1 清代晋南方志中“镇”记载的方式

府州县名	“镇”被集中记载的条目	出处
平 阳 府	平阳县 天津；城池·市镇；兵防	雍正《平阳县志》
	临汾县 地理志·坊乡；区乡考	乾隆《临汾县志》；民国《临汾县志》
	洪洞县 县境全图；建置志·村镇	民国《洪洞县志》
	浮山县 城池·市集；关隘·镇堡；图考；疆域·镇堡	同治《浮山县志》；光绪《浮山县志》；民国《浮山县志》
	岳阳县 疆域图；坊里志·关镇/市集/里社	民国《新修岳阳县志》
	曲沃县 城池（境内镇；境内里）；疆域图；营建考·城郭（镇专条）	乾隆《新修曲沃县志》；乾隆《续修曲沃县志》；光绪《续修曲沃县志》；民国《新修曲沃县志》
	翼城县 疆域（坊乡）；城池·市集；全县形势图；疆域·市集营业表；区村	光绪《翼城县志》；民国《翼城县志》
	太平县 坊里志·村堡/市集；建置志·村堡·市集	道光《太平县志》；光绪《太平县志》
	襄陵县 襄陵县全图；疆域略·乡里；营建考·市集	光绪《增修襄陵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
	汾西县 城池·市镇	光绪《汾西县志》
	乡宁县 铺舍·镇堡；乡镇谱	乾隆《乡宁县志》；光绪《续修乡宁县志》；民国《乡宁县志》
	吉州 镇堡	光绪《吉州全志》
蒲 州 府	蒲州府 兵卫	乾隆《蒲州府志》
	永济县 图考；疆域·都图/市集	光绪《永济县志》
	临晋县 舆地图；坊里篇；市肆篇；城池（镇专条）；县全境图；疆域考·要隘	乾隆《临晋县志》；光绪《续修临晋县志》；民国《临晋县志》
	虞乡县 县境全图；建置·坊里	光绪《虞乡县志》；民国《虞乡县新志》
	荣河县 县境全图；城池·各乡村庄/市镇；考四·区村	乾隆《荣河县志》；光绪《荣河县志》；民国《荣河县志》
	猗氏县 城池·镇堡；坊乡里都·市集	雍正《猗氏县志》
	万泉县 县境图；舆地志·城池（四乡）	民国《万泉县志》
解 州 直 隶 州	解州县 疆域略（区村）	民国《解县志》
	安邑县 县治图；城池·坊里·各乡村庄	乾隆《解州安邑县志》
	夏县 建置·城池/坊里/市集；县城图；城池·村堡/坊里；县境全图	康熙《夏县志》；乾隆《解州夏县志》；光绪《夏县志》
	平陆县 城池·村堡/坊里；兵防；营建·集会/里镇/村堡	乾隆《解州平陆县志》；光绪《平陆县续志》；民国《平陆县志》
	芮城县 疆域·天津；舆地志·区村	乾隆《解州芮城县志》；民国《芮城县志》
绛 州 直 隶	绛州 城池·坊乡·堡敦；疆域略（区村）	光绪《绛州直隶州志》；民国《新绛县志》
	垣曲县 兵防	光绪《垣曲县志》
	闻喜县 城池·村堡；疆域（区乡）；兵防	乾隆《闻喜县志》；民国《闻喜县志》
	绛县 城池（境内镇）；城池·坊里；土地志·镇集	乾隆《绛县志》；光绪《绛县志》；

州	稷山县	城池·堡镇	同治《稷山县志》
	河津县	城池·坊里	光绪《河津县志》
隰州直隶州	隰州	图考；疆域·市镇；舆地全图；山川图	康熙《隰州志》；光绪《续修隰州志》
	大宁县	建置·堡寨	光绪《大宁县志》
	蒲县	图考；建置·乡镇；建置·市集	乾隆《蒲县志》；光绪《蒲县续志》
永和县	舆地志·市镇	民国《永和县志》	
霍州直隶州	霍州	疆域·里甲；物产·市集；关隘	道光《直隶霍州志》
	赵城县	坊里	道光《赵城县志》
	灵石县	县境全图；建置志·里甲/市集期	嘉庆《灵石县志》；民国《灵石县志》

由表 3-1 所示，“镇”被集中记载的条目多种多样，可归纳为以下几种：①地图类：包括县境图、县治图、县城图、疆域图、形势图、舆地图、山川图、图考等条目较为集中记载“镇”信息的达 16 个（州）县；②村镇类：包括坊里、乡里、里甲、里社、里镇、乡镇、坊乡、四乡、区村、村堡、都图、各乡村庄等条目较为集中记载“镇”信息的达 25 个（州）县；③商镇类：包括市镇、市肆、市集、镇集、集会、市集期等条目较为集中记载“镇”信息的达 19 个（府、州）县；④关镇类：包括关隘、要隘、关津、镇堡、堡墩、堡寨、兵防、兵卫等条目较为集中记载“镇”信息的达 16 个（府、州）县；⑤城池类：包括列于城池、城郭等条目较为集中记载“镇”信息的只有 3 个县，即曲沃、临晋、绛县，3 县虽将“镇”附入城池的子目录中，但又都辟专条记载相关信息，与县城本身没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进一步考察上述五种记载方式，可以总结出“镇”记载的统一思想。

在①地图类中，有的用同样的图标显示村和镇；有的用小圈表示村、正方形表示镇；有的用长方形表示里和镇；在民国所修的方志中，则绝大多数用双层圆圈表示镇，以此与小（黑）点表示的村庄区分开来。无论以哪种标识落实到地图中，一个（州）县内几乎所有的镇都能在对应的位置上显示出来，尽管大多数地图中并没有逐一显示村庄或里乡的信息。这种以（州）县城为中央、始终坚持标明分散在不同方向镇的作图方式，一是要强调这些聚落在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位于关津、山隘、边界等要冲之地，二是要体现镇在全图坐标中的指示性——除了（州）县城以外的地区，镇可以是四乡的中心代表。这种较为统一的作图思想集中表明了镇可以同里村一样被标注于图中，但在最简明的示意图里，镇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由此断定，镇在地图展示中其地位大大超过普通乡村。

在②村镇类中，镇被集中记载于“乡里”的州县频率最高，占全数府州县额的 68%，就连城池类仅有三县中的临晋与绛县同样视镇为乡村聚落，将镇同普通村

庄一样排放在里坊之中，记载方式类如：“二贤乡在县东南，统里九……太全里村十一：水峪、太峪、介峪、庄子、上庄、小张、李店、冯村、北王、赵伊镇、太谷屯”<sup>①</sup>。“仁二里村七，城东、城西、东马村、马村屯、樊桥镇、樊西堡、樊北堡”等等<sup>②</sup>。在此种记载中，还经常出现镇村后缀词混用的现象。一般情况下，普通的乡村聚落多被命名为某村、某庄、某堡、某寨等，某庄等其实就是某村，指同一个地理实体，然而，村镇在指示代词的关系上却并非如此。例如，镇可呼为村、堡、寨等，隆化镇称隆化村<sup>③</sup>，仁义镇称仁义村，南关镇称南关村<sup>④</sup>，辛庄镇称辛庄村，水头镇称水头村<sup>⑤</sup>，大杜镇称大杜堡<sup>⑥</sup>，茅津镇还可以被称作茅津寨<sup>⑦</sup>等，反之不然。因此，镇呼为村、寨等名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村呼为镇具有选择性和特殊性。正如河津县志云：“国朝编户归并十七里，隶村庄镇堡一百五十有七”<sup>⑧</sup>所点明，“镇”当同其它村庄堡寨，属于乡村的范畴同隶于里下，但决不等于于普通乡村聚落，处处显示出其优越性来。

在③商镇类中，一些“镇”常常因具有经济功能而同“市”、“集”排放在一起。通常情况下，被置于市集、镇集、集会、市集期等条目中的“镇”基本上都有各自的集期，定期或不定期的开展商业贸易活动，只要满足了该指标，就可以判定此镇具有经济功能。凡是具备商业贸易的镇，往往是一方乡村经济活动的中心，备受官方高度重视，有的镇还驻扎着政府派出的特别机构和官员加以调控。但是，当“镇”被置于市镇条目之下时，所列镇的功能与类型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sup>⑨</sup>。兹举两例以详原由。民国《永和县志》卷一舆地志·市镇条析列如表 3-2：

表 3-2 民国《永和县志》市镇记载方式

市镇名称	备注
北关镇	正、四、七、十、十二月会
永和关镇	县西七十里，三月会
桑壁镇	县东五十里，三、八、九、十月会
岔口镇	县北三十里，今废
刘台镇	县北四十里，今废

① 光绪《永济县志》第一卷《疆域·都图》。

② 乾隆《临晋县志》卷 1《上篇·坊里篇》。

③ 光绪《翼城县志》卷 5《山川·关津》。

④ 嘉庆《灵石县志》卷 2《建置志·里甲》卷三《食货志·仓储》。

⑤ 康熙《隰州志》卷 22《兵防》。

⑥ 同治《稷山县志》卷之 1《城池·堡镇》。

⑦ 光绪《平陆县续志》卷之上《营建类·里镇》。

⑧ 光绪《河津县志》卷 3《城池·坊里》。

⑨ 事实上刘景纯、张萍对此早已有所关注，刘景纯认为在黄土高原方志的记载中“镇市与村集相混，地名镇与市镇不分”，参见其著作《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 42 页；张萍强调“所谓市镇均不能完全视作以商品交易为主要职能的经济中心地”，参见其著作《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明清陕西区域市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年，第 181 页。

结合县志内容综合分析：北关镇、桑壁镇定期举行集会，具有商品交换的功能，应该具有商镇性质；永和关镇也称永和关渡，清廷于此设营，驻把总一员，守兵三十，具有军事防御的功能，但此镇同时也定期开展商业活动，因此，永和关镇具备两种功能，可以称之为多功能镇或混合镇；岔口镇与刘台镇只知大致方位和离县城的距离，之前是否开展集会活动、是否驻扎官兵防守、是否演变为无异村落的地名镇等诸多情况都不得而知，凭此信息只可判为废镇，决不能因其位列“市镇”条下就轻易判定它们具有商业贸易的功能。

康熙《隰州志》卷四疆域·市镇条情况相同，见表 3-3：

表 3-3 康熙《隰州志》市镇记载方式

市镇名称	备注
件城镇	州南六十里，正、七、十月，二、八、十一月会
义泉镇	州东四十里，二、七、九月会
均庄	州北四十里，每月三、八日集
石口子	州北七十里，每月四、九日集
张家川	州东九十里
蒿城镇	州北七十里，正、四、十月会
水头镇	州北九十里，每月一、五日集，正、八、十一月会，今废
康城镇	州北一百里，每月一、六日集，正、三、八、十一月会
大麦交镇	州北一百八十里，每月五、十日集
罗真镇	州西五十里
辛庄镇	州东北一百里，每月五、十日集
回龙镇	州东北二百里，每月三、九日集，正、十月会
西曲镇	州东北二百里
在城南北街	逢二、七、五十日集
北门外	正月、十月会
西门外三义庙	五月、十二月会
东岳庙	三月二十八日会

结合州志内容综合分析：件城镇设有铺递，集商品交换与传送文书双重职能，为多功能镇；义泉镇、水头镇、辛庄镇、回龙镇驻守防兵，也有定期集会，为多功能镇；蒿城镇、康城镇、大麦交镇具有经济功能；罗真镇、西曲镇仅有方位和离城距离，无法确定是何种类型；张家川没有列出固定集期，却又被置于“市镇”条下，只是未以“镇”命名而已，它同件城镇、水头镇、罗真镇、西曲镇、回龙镇一样，均设有土堡；均庄、石口子有定期月集，为州北乡村商贸活动的主要场所，和普通村落相比其经济意味突显，具有和商镇一样的功能；在城南北街、北门外、西门外三义庙、东岳庙也有固定的集会，是城内或城周商品流通的载体。

方行认为“方志中所说的‘市镇’，实际是包括虚集与市镇”<sup>①</sup>两方面，这和目前研究江南市镇的大多数学者的观点一致，即“市镇”专指村集与商镇。通过对清代晋南方志的考察，“市镇”包含的两方面内容似有出入：一是“市”，指商品流通的载体，城市、镇市、村集、庙会都属于“市”记载的内容；二是“镇”，明确以“镇”命名、具有多种职能的地理实体或未以“镇”命名但同商镇一样是乡村经济活动主要展开地的聚落，后者也属于“市”的内容。很明显，“市镇”中记载的以“镇”命名的聚落并非全是商镇，可能还会包括军镇、驿镇、地名镇、废镇等，推测大多数镇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功能。据此，“市镇”的研究范围当是见之于方志所载的“市”与“镇”，包括一切具有商贸活动的地理实体和其它非经济性质的各类镇。

在④关镇类中，关隘、要隘、关津等条目下列出的镇在地理位置上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堡镇（镇堡）、堡墩、堡寨等条目下列出的镇普遍具有防御功能；列于兵防、兵卫等条目下的镇更见其在官方军事战略部署中的地位和作用。通常而言，战略位置越要冲，被派驻的官军级别就越高，兵额也就越多。无论是政府部署中的重镇还是乡间自我防御的堡镇，这些具有军事意义的关镇无疑是当地御敌自卫的屏障，是一方乡民的心理长城和避难港湾。仍需赘言，哪怕是记载于关镇类条目下的镇，仍应视其实际情况鉴别其具体职能。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一些完全以军事防御为主要职能的关镇可能转变为其它类型的镇，也可能湮没成无异村落的地名镇或沦为废镇。据对清代晋南不同时期方志的考察，关镇类的记载大多沿袭前代内容，若仅凭此信息是不能反映出这些演变的。因此，当尽可能的搜集出有关镇记载的信息综合加以分析，才能客观全面的做出职能鉴别，得出准确的判断结果。

通过对上述较为集中记载镇信息的五大类别的考察，镇首先被视为乡村聚落而同其它村庄堡寨一样被收录于乡里的范围，而没有行政上的级别之分。其次，由于镇担负着不同的职能从而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也正因如此，镇又被分散记载于不同的目录之中，其作用与地位超过了普通村落。换句话说，镇与村有着本质的相似性，而不同之处正是它比普通村落优越的原因。

## 第二节 “镇”孕育于乡村土壤

从镇本身的形成和演变看是可以找出村镇两者间的相似性——即镇始终是扎根并限囿于乡村的土壤之中。在晋南地区，“古人因隘置关所，以察非常、防寇贼，

① 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

虽无天险而尤必殚计置之”<sup>①</sup>。在清代以前，为了设防驻守的需要，在特殊的地理位置，往往设立了一些纯粹以军事防务为主要功能的镇。例如：“隆化镇即隆化城，周镇，东四十里，东据乌岭，西临翼城，南连绛县，北接浮山，扼要地也。北齐隆化元年，周武帝取涪州，齐置镇于此以御周师，故名隆化”<sup>②</sup>。此外，武平二年斛律光率众于稷山县筑平陇、卫壁等镇成十有三所；灵石县之南关镇、仁义镇、冷泉关等镇都是在当时的战略需要下所设置的军镇。随着时空条件的改变，这些单纯性质的军镇有的依然保留着传统的特征，有的却在社会、政治、经济、交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转变为其它类型的镇。又以隆化镇为例，金兴定三年曾将其升级为隆化县，元宪宗二年废，延至清代仍名为隆化镇。由于地当孔道，为商旅往来之所必经，因而发展有市集，实亦扼要之区。“但是镇不临边境又非险隘要口，自绝对无派警设防之必要”。到民国，“以今地势论之，谓隆化为一重镇则可，谓为关隘则非也”<sup>③</sup>。可以看出，隆化经由军镇——行政镇——商镇的演变轨迹，这正好反映了清代晋南地区一部分镇是在以前军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事实。

除此以外，有相当多的镇直接是由以前的村、庄、堡、寨演变而来的，从前面提到的村镇后缀词混用的现象可窥一斑。为了防止盗寇袭击，政府通常倡导劝谕百姓修筑堡寨自卫，在清代晋南地区，各村落有堡寨者乃是普遍现象，从堡寨转变为镇的例子是不少的，平陆县茅津镇；垣曲县迎驾镇、六郎镇；绛县南樊镇的前身只是村寨；岳阳县和川镇、故县镇、唐城镇；汾西县对竹镇、乾河镇；安邑县北相镇、陶村镇、霍赵镇；平陆县张店镇；稷山县下迪镇、大杜镇、吴城镇；绛州泉掌镇；芮城县陌底镇；永济县吕芝镇、赵伊镇等均由堡而来，甚至在有的县志里，镇就是土堡，如“杜村镇城在县南，土堡；下任镇城在县西，土堡”<sup>④</sup>；“解店镇，土城”<sup>⑤</sup>等；还有从渡口、村集演变而来的稷山县玉壁镇；河津县禹门镇、双营镇；灵石县夏门镇等。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或交通状况的改善，那些普通的乡村聚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往往成长为不同类型的镇。

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些镇是在官方的刻意扶持下产生并成长起来的，如太平县之清储镇。“出太平县城南十里许有汾阴山，东西绵亘高阜，当古晋城上游，在昔多草木蓊如也，后芟夷殆尽，濯然成广坡云，且其地瘠薄，分入南毛南贾坊定兴诸里，居民播种鲜利，久之委成荒区，里人赔赋力累不堪，率逃移去”<sup>⑥</sup>。“迄今

① 同治《浮山县志》卷之7《关隘·镇堡》。

② 光绪《翼城县志》卷5《山川·关津》。

③ 民国《翼城县志》卷2《疆域·关隘》。

④ 雍正《猗氏县志》卷之1《镇堡》。

⑤ 民国《万泉县志》卷1《舆地志·城池》。

⑥ 道光《太平县志》卷13《艺文上·清储镇开荒田记》。

且道杂经其上，道傍类多谿壑，一二不逞子弟往往肆为奸盗，而出途者父子兄弟相戒也”<sup>①</sup>。明万历十七年，知县侯于鲁至，即见此等状况，认为“养民而弃地利非计也，防民而暴之中野出途，谓何是阜也”，“乃即其颠为镇”，“建内置仓宇公馆一所，民舍百数十间。”“凡垦过四千四百三十六亩八分，招过贫民九十四家，计口授屋，量力给田，散之牛种以为资本，与之帖券以杜争端，联之保甲以防寇盗”<sup>②</sup>，在官方招抚政策下产生的清储镇不断发展，到崇正五年筑堡，至康熙三十六年还拓了东城<sup>③</sup>。与清储镇相同，夏县之喜安庄镇也是在类似的背景下产生的。喜安庄旧名牛家凹，在县西三十里西张店，由于“地瘠民逃，且四面村落相去遥远，盗贼生发，行者病之”<sup>④</sup>。“万历元年知县陈世宝申请当道建堡、庐舍，招復流移，给以牛种，多方抚恤而归者云集，盗贼屏息，不踰年而成钜镇。”“万历十五年而后，岁屡次凶歉，民复逃窜。至十九年知县高奎復行给牛賑谷，停租免役之賑，民復翕然归之，仍设法招来贫民四十余家，垦地三百余亩，展堡广十丈袤六十丈，起盖房五十间，以棲流移，以为贫民安居之地，仍修南门楼一座，名曰保安庄。今墙垣坚厚居民稠密，仍旧名焉”<sup>⑤</sup>。上述两镇的形成虽明显带有官方色彩，但总体特征不变，都是因为孤村穹远，土地贫瘠，民逃不治，贼盗窃发，为了加强管理与控制，当地政府所实施的招安措施的一种落实结果。两镇除了人口和规模大于普通村庄外，镇中居民的成分、谋生手段和管理方式与普通村庄别无它样，更像是贫民收容所发展壮大的巨型村落，因而，由官方扶持产生的镇也深深的打上了乡村的烙印。

### 第三节 “镇”实为乡村中心地

尽管清代我国北方地区的镇属于乡村的范畴，但它决不完全等同于普通村落，除了在人口和规模上存在着较大的悬殊外，功能方面的大小之别是区别镇与普通乡村的重要标志。

从前面提及的清储镇可看出镇比普通村落的人口更为稠密。以光绪时期平陆县划分村庄等级标准作为参考，该县“大小村庄九百六十有二，计大村五十三（五十户以上为大村），中村一百五十一（十户以上为中村），余则三五家及一两家为一村”<sup>⑥</sup>，以此计算，则十户以下的村落占据了全部乡村的4/5左右，中、小村庄

---

① 道光《太平县志》卷13《艺文上·新建清储镇记》。  
② 道光《太平县志》卷13《艺文上·清储镇开荒田记》。  
③ 道光《太平县志》卷3《坊里制·村堡》。  
④ 康熙《夏县志》卷之1《建置志·城池》。  
⑤ 乾隆《解州夏县志》卷之3《城池·村堡附》。  
⑥ 光绪《平陆县续志》卷之上《营建·村堡》。

即五十户以下成为普通乡村人口情况的大致基准，这和普通镇的人口是没法比的，如崞阳镇，光绪三年土著七百五十四户，男妇大小二千三百八十一名口；香落镇，光绪三年土著五百五十二户，男妇大小二千三百名口；杜村（镇）光绪三年土著四百八十九户，男妇大小二千六十三名口<sup>①</sup>。就连大禄户口逃亡后的茅津镇也有五百户，葛赵镇、常乐镇也可以达到二百余户<sup>②</sup>。可以看出，普通镇的人口应该在百户以上，是一般村落的数倍之多，应该列入上述划分等级中的特大型。

人口的增加势必带来聚居地的扩张，镇的规模也就相应大于普通村落。一般说来，小镇城墙的周长可达两里多，高一丈五尺左右，普通镇的规模还要大于这个数据。以茅津镇为例，该镇东西广二里余，南北袤一里，周五里，计筑土垣二百余丈，高二丈，因地势深宽不一，寨门六<sup>③</sup>。清储镇“先南北门，门有楼，次垣次屋，屋东西向，又东偏为官亭三楹，亭凡再进，前后翼室十楹，即其前为义仓……而亭之最前曰乡甲，令岁时讲约……镇西北当乾地，正北当坎地，地宜高峻，于是即乾地为真武庙，即坎地为龙王庙。又因泉为井，因壑为池”<sup>④</sup>。其“堡占地凡六十八亩，其缭以垣也。凡长五百三十步，高一丈三尺，垣之南北为门二，各甃以砖石，上覆以屋凡三楹，垣以内两相向为舍，凡一百四十二间，其后各有余址，可为场圃，中置义仓一所，堂宇爽塏，门墙深固可憩可藏，垣以外挑壕，广九尺深七尺，下植榆杨诸木……为井五，可充汲引，为池二，可备溢潦环堡荒田”<sup>⑤</sup>。可以想象，五十户以下的村落不论在规模还是在形态方面，较之普通的镇仍存在相当的差距。

如果说人口与规模只是区别镇和村的外在条件，那么功能的大小之别当是区分二者的根本所在。仍以康熙《隰州志》为例，在市镇条下罗列了城市、镇市、村集与庙会等所有承载该州商贸活动的地理位置共 14 处，其中，明确以镇命名的聚落就有 8 处，它们不仅有定期的月集，甚至还开展庙会，在隰州整个市场圈中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在该志卷一图考·总图中，全图并未标明具体村落，而均庄、石口子（则）却与其它镇一样出现在相应的位置，很可能它们只是不以“镇”命名而已。如此计算，镇在全州的商业地位还将上升。若保守地将它们看作村落，则村集不仅在场址上大大低于镇市，而且在场数上更是相差甚远。从经济的角度比较，商镇的功能显然远远大于普通村落，至于军镇和驿镇的功能就无需赘言了。在历史的长河中，随着镇的不断演进，其功能往往越来越多地融合为一体：人口

① 光绪《续猗氏县志》卷 1《户口》。

② 光绪《平陆县续志》卷之上《营建·村堡》。

③ 光绪《平陆县续志》卷之上《营建·村堡》。

④ 道光《太平县志》卷 13《艺文上·新建清储镇记》。

⑤ 道光《太平县志》卷 13《艺文上·清储镇开荒田记》。

不断聚集，规模渐次扩大，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商品交换活动，设立起了铺递、驿站，甚至有实力承担学堂和设立仓储，成为一方乡土文教与救济场所等等。不同类型的镇在乡村的广阔大地上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行政中心、贸易枢纽、递运基地、社会控制战略要塞……这些中央性机能充分证明了镇是乡村中心地的事实。

通过对清代晋南方志的考察，从镇的形成和演变看，它始终没有脱离乡里的胚胎，仍然以乡村聚落的形式存在并发展。它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乡村的范畴，还同普通村落一样处于同一行政级别；横向上它们是点与面的关系，纵向而言却又并驾齐驱同为里下分支。通过进一步剖析，镇必然担当诸如商业贸易、传递物资文书、军事防御等多种职能，比或然具备某项职能的普通乡村功能更大，地位更突出<sup>①</sup>；在人口与规模方面，镇也处处显示出优越性来。简言之，清代晋南地区村镇关系在范畴上镇属于村，职能、人口、规模方面却又大于等于村。可以这样理解，清代晋南地区的镇从根本上和村是没有本质区别的，它只不过是在特定条件下发展膨胀起来的巨型乡村聚落，和今天意义上的“小城镇”尚有区别，清代晋南“镇”的属性当定位于乡村范畴更为妥切。因此，应当加大对镇和历史时期乡村相互作用的研究力度，确保村-镇-城链条上每个环节研究的持续健康发展。

---

<sup>①</sup> 地名镇、废镇除外，废镇代表过去时，不当列入镇的类型；而地名镇正是丧失了原有的功能演变为普通村落，返回原形，更体现了其乡村范畴的属性。

## 第四章 清代晋南镇的类型、分布与发展

关于镇的研究，值得挖掘和深入探讨的区域有很多，不应仅限于江南地区，而且，真正意义上实现镇研究的突破还有待于加强对历史时期镇本身的探索。因此，本章拟对清代晋南镇的类型、分布和发展进行初步讨论，以期层层跟进，掌握该区域内镇的构成和演变脉络。

### 第一节 清代晋南镇的类型

镇类型的划分，可因标准不同而异，笔者主张以镇承担的职能来作为划分镇类型的依据，并补充为以下 5 种：为府、县政区治所或派出有政府机构、主要体现政治性职能的行政镇；位于地理要冲并驻扎有相应数量的兵官、以镇守为主要职能的军镇；位于孔道网络之中、以为官方交流服务（接待官员往来、传达信息、递送物资等）为主要职能的驿镇；位于便利的交通位置，以商品流通为主要职能的商镇；上述多种职能并重谓之混合镇，也可以称为多功能镇。在某一特定的时期，镇的某种功能突显到完全能够代表该镇的特征时，以它的这种显著特征作为该镇区别于它镇的标准。换言之，当镇的两种或多种功能并存且同时成为该镇的总体态势时，则视其为混合镇。

本章收集的镇是见之于方志中明确以镇命名的聚落共 233 个，有足够文献信息进行类型判定的共 158 个。在判定镇类型的原则中，以绿营建置中至少是有外委以上级别的官兵驻防方可认定其具有军镇性质，而非以仅有几名守兵的小汛为基准；以明确记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商贸活动来评判是否具有商镇性质，而不是以载入方志中“市镇”条目下作为评判条件；此外，很多镇还承担着乡村文化（学堂）与救济（仓敖）的功能，但政治、军事、经济与驿递四种不同性质的功能足以使该区镇的类型鲜明的区分开来，故略去二者。清代晋南各镇类型判定如表 4-1：

表 4-1 清代晋南镇类型评判表

府州	县名	镇名	派出机构	官兵驻防	市集/商贸	驿站/铺递	类型评定
平 阳 府	临汾县	高河镇				√	驿镇
		郭盆镇			√	√	商镇驿镇
	洪洞县	苏堡镇			√		商镇
		杨曲镇					√
	浮山县	东张镇			√		商镇
		响水河镇			√		商镇
	岳阳县	府城镇			√		商镇
		和川镇			√		商镇

		故县镇			√		商镇
		唐城镇			√		商镇
	曲沃县	蒙城镇			√	√	商镇驿镇
		侯马镇	√		√	√	多功能镇
		西庄镇			√	√	商镇驿镇
		曲村镇			√		商镇
		高县镇			√		商镇
		王村镇			√		商镇
		东阎镇			√		商镇
		下邬镇			√		商镇
		隘口镇			√	√	商镇驿镇
	翼城县	隆化镇			√	√	商镇驿镇
		北常镇			√		商镇
		中卫镇			√		商镇
		吴村镇		√			军镇
		水清镇			√		商镇
	太平县	古城镇			√	√	商镇驿镇
		赵康镇			√	√	商镇驿镇
		汾阳镇				√	驿镇
		史村镇	√	√	√	√	多功能镇
	襄陵县	京安镇			√		商镇
		赵曲镇		√	√		军镇商镇
	汾西县	芹香镇			√	√	商镇驿镇
		凤头镇			√		商镇
		僧念镇				√	驿镇
		水润镇			√	√	商镇驿镇
	乡宁县	船窝镇			√		商镇
		西坡镇				√	驿镇
		营里镇				√	驿镇
		官水镇			√	√	商镇驿镇
	吉州	桃园镇			√		商镇
		大度镇			√		商镇
三垢镇				√	√	商镇驿镇	
瑶渠镇				√		商镇	
临峪镇				√		商镇	
蒲州府	永济县	永乐镇	√		√		行政镇商镇
		栲栳镇			√	√	商镇驿镇
		吕芝镇				√	驿镇
		黄龙镇			√		商镇
		赵伊镇			√	√	商镇驿镇
		高翁镇			√		商镇
		东张镇			√	√	商镇驿镇
		匡河镇			√	√	商镇驿镇
		韩阳镇			√		商镇
临晋县	周吴镇			√	√	商镇驿镇	

		七级镇			√		商镇		
		樊桥镇		√	√	√	多功能镇		
		城西镇			√		商镇		
		卓里镇			√		商镇		
		虞乡镇			√		商镇		
	虞乡县	孙常镇			√		商镇		
		平壕镇			√		商镇		
		古市镇		√	√		军镇商镇		
		卿头镇			√		商镇		
	荣河县	薛吉镇			√	√	商镇驿镇		
		冯村镇			√	√	商镇驿镇		
		王黑镇			√		商镇		
		孙吉镇			√		商镇		
		庙前镇			√		商镇		
		王显镇			√		商镇		
		后土祠镇			√		商镇		
	漪氏县	下任镇			√	√	商镇驿镇		
		杜村镇			√		商镇		
	万泉县	皇甫镇			√		商镇		
		薛店镇			√		商镇		
		东塬底镇			√	√	商镇驿镇		
		解店镇			√		商镇		
	解州直隶州	解州	长乐镇	√			√	行政镇驿镇	
			席张镇			√	√	商镇驿镇	
			盐池镇	√				行政镇	
		安邑县	北相镇					√	驿镇
			陶村镇			√		√	商镇驿镇
			霍赵镇					√	驿镇
			泓芝镇					√	驿镇
			下段镇				√		商镇
圣惠镇		√				√	行政镇驿镇		
夏县		水头镇			√		√	商镇驿镇	
		胡张镇		√	√		√	多功能镇	
		裴介镇			√		√	商镇驿镇	
	曹张镇			√		√	商镇驿镇		
	尉郭镇			√		√	商镇驿镇		
平陆县	茅津镇	√	√	√		√	多功能镇		
	张店镇		√	√		√	多功能镇		
	八政镇			√		√	商镇驿镇		
	太宽镇			√		√	商镇驿镇		
	张峪镇			√			商镇		
	常乐镇			√			商镇		
	葛赵镇			√			商镇		
芮城县	洪池镇			√			商镇		
	陌底镇	√		√		√	多功能镇		

绛州直隶州	绛州	三林镇				√	驿镇	
		三村镇				√	驿镇	
	垣曲县	王茅镇					√	驿镇
		皋落镇					√	驿镇
		同善镇					√	驿镇
	闻喜县	东镇			√	√		商镇驿镇
		兰德镇			√	√		商镇驿镇
		郭店镇			√	√		商镇驿镇
		宋店镇			√	√		商镇驿镇
		栗村镇			√			商镇
	绛县	大交镇			√			商镇
		横水镇		√	√	√		多功能镇
		南樊镇			√			商镇
		郑柴镇			√			商镇
	稷山县	下迪镇					√	驿镇
		管村镇					√	驿镇
		翟店镇			√			商镇
		华峪镇			√			商镇
	河津县	禹门镇	√				√	行政镇驿镇
		清涧镇					√	驿镇
		双营镇			√			商镇
		僧楼镇			√			商镇
		东张镇			√			商镇
		方平镇			√			商镇
隰州	件城镇			√	√		商镇驿镇	
	义泉镇			√	√		商镇驿镇	
	蒿城镇			√			商镇	
	康城镇			√			商镇	
	大麦交镇			√			商镇	
	罗真镇			√			商镇	
	辛庄镇			√			商镇	
	回龙镇			√			商镇	
	西曲镇			√			商镇	
	广武镇	√					行政镇	
大宁县	石口子镇			√			商镇	
	马斗关镇					√	驿镇	
蒲县	化乐镇			√	√		商镇驿镇	
	张村镇		√	√	√		多功能镇	
	乔家湾镇			√			商镇	
	薛关镇			√	√		商镇驿镇	
	古驿镇			√			商镇	
	公峪镇			√			商镇	
永和县	北关镇						商镇	
	永和关镇		√	√			军镇商镇	
	桑壁镇		√	√			军镇商镇	

霍州直隶州	霍州	刘台镇				√	驿镇	
		幸置镇				√	驿镇	
		师庄镇				√	驿镇	
		周村镇				√	驿镇	
		北关镇				√	驿镇	
	赵城县	窑子镇				√	驿镇	
	灵石县	水头镇		√				军镇
		索州镇					√	驿镇
		仁义镇	√			√	√	多功能镇
		双池镇				√		商镇
		小水镇				√		商镇
		冷泉镇		√			√	军镇驿镇
		高壁镇					√	驿镇
夏门镇					√	商镇		

说明：清代晋南地区镇类型多为单功能镇，为了在表中更直观反映镇的类型，凡多功能镇中具备两种性质的镇依然列出具体职能，三种或三种职能以上简称多功能镇。

通过对上表分析，清代晋南地区镇的类型包含两大类：单功能镇 103 个，多功能镇 55 个，其中双功能镇 45 个，三功能镇 8 个，四功能镇 2 个；单功能镇中商镇和驿镇为主体，分别为 72 个、27 个，纯粹的军镇和行政镇数量非常少，各有 2 个；多功能镇中商镇驿镇有 36 个，超过了 3/4，占绝对的优势；三种功能以上的镇仅 10 个，这表明双功能镇是清代晋南地区多功能镇的主要代表，尤以商镇驿镇为显著特征。一般来讲，镇的功能越多，表明其越发达，地位越高，按此推论，则清代晋南地区的大镇、要镇数量不多。具体数额见表 4-2：

表 4-2 清代晋南各类型镇数量统计表

单功能镇 (103 个)				双功能镇 (45 个)				
行政镇	军镇	商镇	驿镇	行政镇商镇	行政镇驿镇	军镇商镇	军镇驿镇	商镇驿镇
2	2	72	27	1	3	4	1	36
三功能镇 (8 个)						四功能镇 (2 个)		
行政镇军镇驿镇		行政镇商镇驿镇		军镇商镇驿镇		行政镇军镇商镇驿镇		
1		2		5		2		

进一步考察上述镇的类型，将凡是承担某种相同功能的镇归为同一性质类别，则具有商贸性质的镇成为清代晋南镇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其比率达到了 3/4 以上，这表明清代该区域内的镇已经具有普遍且明显的经济意味；其次，驿递性质的镇比率不小，占 48.7%，以政府军政传输服务为主要目的镇仍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军事性质的镇在比率上虽不大，但仍不可忽视，它们是清代地方政府战略部署中的重要环节；行政性质的镇比率虽然最小，意义却深远。邓亦兵认为派驻有机构和官员的市镇往往是较大的市镇<sup>①</sup>，同理也适用于镇，不仅如此，清代晋南地区行

① 邓亦兵：《清代前期的市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 年第 3 期。

政性质的镇通常位于交通发达或地理要冲之地，根据派出官员级别的不同可以考察各镇的发展状况。因此，要估测当地镇的发展水平当充分重视对派驻有政府机构和官员的镇的考察。清代晋南各性质镇数量比率见表 4-3:

表 4-3 清代晋南各性质镇数量统计表

	行政性质镇	军事性质镇	商贸性质镇	驿递性质镇
数量	11	15	116	77
比率	7%	9.5%	77.2%	48.7%

说明：比率=各性质镇数量÷镇总数（158个）

## 第二节 清代晋南镇的分布

在历史时期，镇的分布更多的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清代晋南镇的分布同样如此。考察这一地区镇的分布，旨在探求其空间结构的特点与规律，为当前镇的发展与规划提供历史依据。

清代晋南镇在地理分布上有三大显著的特征（图 4-1）：一是沿河流与谷地的分布突出，在黄河拐弯的地带，汾河、涑水、昕水河、浍水等河流两岸成为清代晋南镇分布的主干线，诸镇于两岸谷地交错相间，形成以主干河流分布为主，支流分布为辅的树型结构；二是镇集聚于驿路与孔道沿线，设有驿站和铺递的镇自然多位于此，另外，需要便利的交通条件作为前提的商镇也簇拥在这些大大小小的交通线上；三是不规律的点状分布，这些镇多位于县界、关隘和渡口，是军镇的主要驻扎点，由于受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这些镇散布在晋南各县。



4-1 清代晋南地区镇分布示意图

清代晋南镇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密度大小，一是离（州）县城距离。在清代，晋南可以从行政上划分为六个区域，即两府四直隶州。整个晋南片区州县有 35 个，镇 233 个，其分布的平均密度为 6.5/1000 平方公里。具体说来，平阳府辖 11 州县，境内镇 72 个，镇分布的密度为 5.3/1000 平方公里；蒲州府辖 6 县，境内镇 42 个，镇分布的密度为 11/1000 平方公里；解州直隶州辖 5 州县，境内镇 30 个，镇分布的密度为 7.1/1000 平方公里；绛州直隶州辖 6 州县，境内镇 44 个，镇分布的密度为 8.2/1000 平方公里；隰州直隶州辖 4 州县，境内镇 26 个，镇分布的密度为 4.2/1000 平方公里；霍州直隶州辖 3 州县，境内镇 19 个，镇分布的密度为 7.3/1000 平方公里。按照密度大小排序，分别为蒲州府、绛州直隶州、霍州直隶州、解州直隶州、平阳府、隰州直隶州。参见表 4-4：

表 4-4 清代晋南镇分布密度表

府州	州县数	辖镇数量	面积(平方公里)	密度(镇/1000平方公里)
平阳府	11	72	13520	5.3
蒲州府	6	42	3830	11
解州直隶州	5	30	4222	7.1
绛州直隶州	6	44	5364	8.2
隰州直隶州	4	26	6146	4.2
霍州直隶州	3	19	2602	7.3
总计	35	233	35684	6.5

说明：府州面积以《山西省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为蓝本测算。

一般说来，出于统治和管理的需要，县志和通志大多都记载各镇同（州）县城的距离，此类数据为研究镇的空间分布提供了依据。本文收集到记载有明确里程的镇共 164 个，详见表 4-5。

表 4-5 清代晋南镇离（州）县城距离统计表 单位：里

县名	镇名	距离	县名	镇名	距离	县名	镇名	距离
临汾县	高河镇	7.5	吉州	车城镇	20	闻喜县	东镇	30
	乔里镇	20		三垢镇	20		栗村镇	35
	金店镇	20		瑶渠镇	60		兰德镇	50
	泊庄镇	10	永乐镇	110	郭店镇		20	
	刘村镇	20	栲栳镇	30	宋店镇		10	
	吴村镇	25	永济县	黄龙镇	35	绛县	大交镇	40
	县底镇	20		赵伊镇	30		横水镇	60
	东亢镇	30		高翁镇	35		南樊镇	30
	古镇	25		东张镇	50	稷山县	下迪镇	20
洪洞县	郭盆镇	35		匠河镇	50		大杜镇	20
	万安镇	20		韩阳镇	15		小河镇	15
	曲亭镇	25	临晋县	周吴镇	20		华峪镇	20
		六龙镇		20	翟店镇	30		

	故逻镇	40		七级镇	25		平陆镇	5	
	赵村镇	30		樊桥镇	15		玉壁镇	12	
	苏堡镇	25		城西镇	20		吴城镇	10	
	杨曲镇	20		卓里镇	20		禹门镇	25	
浮山县	东张镇	15	虞乡县	孙常镇	10	河津县	清涧镇	15	
	王村镇	25		古市镇	10		仓头镇	10	
	府城镇	120		乡头镇	40		僧楼镇	25	
岳阳县	和川镇	90		北相镇	30			樊村镇	20
	故县镇	45	安邑县	陶村镇	15		件城镇	60	
	唐城镇	80		霍赵镇	10		义泉镇	40	
曲沃县	蒙城镇	40		泓芝镇	40	隰州	蒿城镇	70	
	柴村镇	9		圣惠镇	5		水头镇	90	
	侯马镇	30		下任镇	20		康城镇	110	
	西庄镇	20	张岳镇	20	大麦交镇		180		
	曲村镇	25	东墙底镇	20	罗真镇		50		
	高县镇	20	解店镇	10	辛庄镇		100		
	王村镇	25	薛吉镇	40	回龙镇		200		
隘口镇	50	王显镇	30	张家川镇	90				
翼城县	东阎镇	25	猗氏县				西曲镇	200	
	下驷镇	32		荣河县	庙前镇		8	广武镇	100
	隆化镇	40			孙吉镇	30	马斗关镇	70	
	北嫩镇	20		冯村镇	20	安阜镇	10		
襄城县	北常镇	8		王黑镇	30	蒲县	化乐镇	40	
	中卫镇	10		水头镇	35		张村镇	60	
	古城镇	25	夏县	胡张镇	30		乔家湾镇	70	
	赵康镇	25		裴介镇	15		薛关镇	20	
清峪镇	10	曹张镇		40	古驿镇		35		
史村镇	40	尉郭镇		10	公峪镇		70		
襄陵县	京安镇	40			官庄镇	30	永和县	岔口镇	30
	赵曲镇	20			茅津镇	20		永和关镇	70
	芹香镇	60		平陆县	张店镇	60		桑壁镇	50
山云镇	70	八政镇	30		刘台镇	40			
南关镇	40	店头镇	2		霍州	幸置镇	20		
僧念镇	20	张峪镇	15			师庄镇	30		
汾西县	对竹镇	60			常乐镇	30	灵石县	索州镇	20
	乾河镇	100			洪池镇	40		仁义镇	40
	西坡镇	70			葛赵镇	40		冷泉镇	50
	船窝镇	110	芮城县		陌底镇	40		高壁镇	20
	营里镇	10			垣曲县	鼓钟镇		50	南关镇
乡宁县	官水镇	90			同善镇	120	绛州	三林镇	30
	长乐镇	10		王茅镇	20	泉掌镇		30	
	西王镇	15		泉落镇	50	泽掌镇		25	
赵城县	窑子镇	5							

说明：表格中的数据以县志记载为基准，县志中未载者以通志记载为补充。

经统计，镇一般分布在距（州）县城 40 里内的区域，其比率达 75%，40 里以外分布则相当零散。距（州）县城较近的区域即 10 里内，镇的分布占 13.4%，其中以 10 里处较为密集；镇最为集中的地方是距（州）县城 11-20 里处，有 42 个，其中 20 里处超出 30 个，占 25.6%，其次是 21-30 里处，共 34 个，占 20.7%，再次是 31-40 里处，共 25 个，占 15.2%；41-100 里内远距离的镇共 33 个，其比率为 20.1%；100 里以外的镇仅 8 个，最远的可达 200 里（参见表 4-6）。

表 4-6 清代晋南镇离（州）县城距离分段统计表 单位：里 比率：%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80	81-90	91-100	100 以外
数量	22	42	34	25	11	7	7	1	4	3	8
比率	13.4	25.6	20.7	15.2	6.7	4.3	4.3	0.6	2.4	1.8	4.9

由图 4-2 可以看出，清代晋南镇离（州）县城里程的分布规律呈波谷型，以 0-10 里分布的 22 个镇为起点，到 11-20 里处呈倍数攀登至最大值，由 21-30 里处开始随离（州）县城距离的增大而逐次下滑，至 81-90 里稍有回升迹象，但起伏微弱，可以忽略不计，整个分布情况呈抛物线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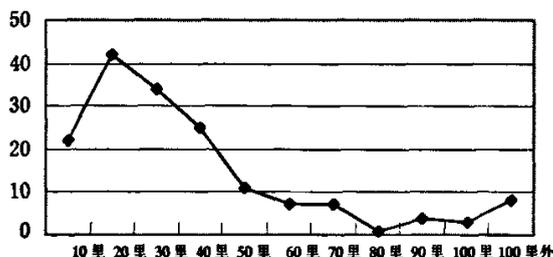


图 4-2 清代晋南镇离（州）县城距离曲线图

前文提到，商业性质的镇和驿递性质的镇是整个清代晋南地区镇的主要构成要素，它们的离城距离分别有着各自的规律。设有铺递的镇与相邻铺递之间大至呈 10 里之隔，而设有驿站的镇之间往往也有着比较恰当的距离，一般在 70-90 里之间。驿递性质镇的这种地理上的分布完全归因于清代的铺驿制度，晋南也不例外，无庸赘言。倒是商业性质的镇有着客观的分布特点。在表 5 收集到记载有明确里程的 164 个镇中，商业性质的镇达 96 个，若仍以 10 里为单位进行分段统计，距（州）县城 40 里内的区域是商业性质镇最密集的范围。通过观察，商业性质的镇离城距离至少为 8 里，10 里以上到 40 里间是其所处空间上的峰值，其分布较为均衡，41-70 里之间的分布明显出现下降趋势，70 里以外则零星分布，最远可至 200 里（参见表 4-7）。清代晋南地区商业性质镇的这种地理空间上的自集性与分散性同市场辐射圈有着极大的关联，其离城距离的分布规律可为当前农村市场开市地点的选择提供借鉴。

表 4-7 清代晋南商业性质镇离（州）县城距离分段统计表 单位：里 比率：%

	0-10	11-20	21-30	31-40	41-50	51-60	61-70	71-80	81-90	91-100	100以外
数量	8	20	20	19	7	6	4	1	3	1	7
比率	8.3	20.8	20.8	19.8	7.3	6.3	4.2	1.0	3.1	1.0	7.3

### 第三节 清代晋南镇的发展

据初步统计（见表 4-8），到清代后期，晋南地区的镇在前期 170 个的基础上新增了 62 个，但有 12 个镇在后期各方志的记载中不见踪迹，实际发展为后期的 220 个，冲抵计算后清代后期晋南镇增加了 50 个；平均每（州）县增加 1.4 个，最高增幅为 5，最低增幅为-2；其中，平阳府辖内的镇在数量上于前后两阶段均为最大值，而从镇分布密度的大小看，蒲州府辖内的镇于前后两阶段均为最大值；另外，从府州增幅大小看，仍以蒲州府为首，为 14 个居冠，其次分别是平阳府 11 个、绛州直隶州 11 个、霍州直隶州 7 个、解州直隶州 5 个、隰州直隶州 2 个；若以密度变化的倍数作标准来考评清代晋南各府州镇的发展状况，则霍州直隶州辖内镇分布密度的增加强度最高，为 1.6 倍、蒲州府仅次，为 1.5 倍、其次为绛州直隶州、解州直隶州、平阳府、隰州直隶州。详细的数据比较参见表 4-9。

表 4-8 清代前后期晋南镇数量明细表

府州	县名	前期（顺治至乾隆）	后期（嘉庆至宣统）	变化	
平阳府	临汾	高河镇 乔里镇 金店镇 刘村镇 吴村镇 东关镇 县底镇 泊庄镇	高河镇 乔里镇 金店镇 刘村镇 吴村镇 东关镇 县底镇 泊庄镇 东亢镇 大阳镇 隰山镇 古镇	+4	
	洪洞	万安镇 曲亭镇 故逻镇 杨曲镇 赵村镇 郭盆镇 敬安镇	万安镇 曲亭镇 故逻镇 杨曲镇 赵村镇 郭盆镇 (后移苏堡镇)	-1	
	浮山	东张镇 王村镇	东张镇 王村镇 响水河镇	+1	
	岳阳	府城镇 冀氏镇 和川镇 故县镇 崇信镇	府城镇 冀氏镇 和川镇 故县镇 崇信镇 唐城镇	+1	
	曲沃	蒙城镇 侯马镇 西庄镇 曲村镇 高县镇 王村镇 东阎镇 下邬镇 隘口镇 柴村镇	蒙城镇 侯马镇 西庄镇 曲村镇 高县镇 王村镇 东阎镇 下邬镇 隘口镇 柴村镇	0	
	翼城	隆化镇 北常镇 中卫镇 北撤镇 水清镇 寒门镇	隆化镇 北常镇 中卫镇 北撤镇 水清镇 吴村镇	-1+1	
	太平	古城镇 赵康镇 清储镇 汾阳镇 史村镇	古城镇 赵康镇 清储镇 汾阳镇 史村镇	0	
	襄陵	赵曲镇 京安镇	赵曲镇 京安镇	0	
	汾西	芹香镇 凤头镇 水润镇 僧念镇	芹香镇 凤头镇 水润镇 僧念镇 南关镇 山云镇 乾河镇 对竹镇	+4	
	乡宁	船窝镇 西坡镇 营里镇 官水镇 长镇	船窝镇 西坡镇 营里镇 官水镇	-1	
	吉州	桃园镇 大度镇 三垢镇 临峪镇	桃园镇 大度镇 三垢镇 临峪镇 瑶渠镇 车城镇 藺古庄镇	+3	
	蒲州	永济	永乐镇 栲栳镇 高市镇 吕芝镇 黄龙镇 东张镇 匡河镇 韩阳镇 东丰镇	永乐镇 栲栳镇 高市镇 吕芝镇 黄龙镇 东张镇 匡河镇 韩阳镇 赵伊镇 高翁镇 永丰镇	+2

府	临晋	周吴镇 七级镇 樊桥镇 虞乡镇	周吴镇 七级镇 樊桥镇 城西镇 六龙镇 卓里镇	-1+3
	虞乡	古市镇 乡头镇 孙常镇 平壕镇	古市镇 乡头镇 孙常镇 平壕镇 孤南镇 普乐头镇	+2
	荣河	薛吉镇 庙前镇 王显镇 孙吉镇 双营镇 冯村镇	薛吉镇 庙前镇 王显镇 孙吉镇 双营镇 冯村镇 胡壁镇 王黑镇 后土祠镇	+3
	猗氏	张岳镇 下任镇 杜村镇	张岳镇 下任镇 杜村镇 帽阳镇 香落镇	+2
	万泉	解店镇	解店镇 皇甫镇 薛店镇 东塬底镇	+3
解州直隶州	解州	长乐镇 席张镇	长乐镇 西王镇 盐池镇	-1+2
	安邑	北相镇 陶村镇 东郭镇 圣惠镇 泓芝镇 霍赵镇 王范镇 下段镇	北相镇 陶村镇 东郭镇 圣惠镇 泓芝镇 霍赵镇	-2
	夏县	水头镇 胡张镇 裴介镇 曹张镇	水头镇 胡张镇 裴介镇 曹张镇 尉郭镇 官庄镇 堰掌镇 义门镇	+4
	平陆	茅津镇 张峪镇 常乐镇 葛赵镇 洪池镇 张店镇 太宽镇 八政镇	茅津镇 张峪镇 常乐镇 葛赵镇 洪池镇 张店镇 太宽镇 八政镇 店頭镇	+1
	芮城		陌底镇	+1
绛州直隶州	绛州	泉掌镇 泽掌镇 三村镇	泉掌镇 泽掌镇 苏村镇 阳王镇 三林镇 三泉镇	-1+4
	垣曲	王茅镇 皋落镇 瞿塚镇	王茅镇 皋落镇 鼓钟镇 迎驾镇 六郎镇 同善镇	+3
	闻喜	栗村镇 兰德镇 郭店镇 宋店镇 裴社镇 东镇 土镇	栗村镇 兰德镇 郭店镇 宋店镇 裴社镇 东镇	-1
	绛	大交镇 南樊镇 横水镇 郑柴镇	大交镇 南樊镇 横水镇	-1
	稷山	小河镇 华峪镇 翟店镇 平陇镇 下迪镇 大杜镇 管村镇	小河镇 华峪镇 翟店镇 平陇镇 下迪镇 大杜镇 青龙镇 吴城镇 玉壁镇	-1+3
	河津	僧楼镇 双营镇 方平镇 东张镇	僧楼镇 双营镇 方平镇 东张镇 禹门镇 清涧镇 樊村镇 固镇 苍头镇	+5
隰州直隶州	隰州	件城镇 义泉镇 蒿城镇 康城镇 罗真镇 辛庄镇 回龙镇 西曲镇 水头镇 大麦交镇 石口子镇	件城镇 义泉镇 蒿城镇 康城镇 罗真镇 辛庄镇 回龙镇 西曲镇 水头镇 大麦交镇 张家川镇 广武 镇	-1+2
	大宁	安阜镇	安阜镇 马斗关镇	+1
	蒲县	化乐镇 张村镇 薛关镇 古驿镇 公峪镇 乔家湾镇	化乐镇 张村镇 薛关镇 古驿镇 公峪镇 乔家湾镇	0
霍州直隶州	永和	桑壁镇 岔口镇 刘台镇 北关镇 永和关镇	桑壁镇 岔口镇 刘台镇 北关镇 永和关镇	0
	霍州	幸置镇 师庄镇	幸置镇 师庄镇 北关镇 南埧镇 周村镇	+3
	赵城		窑子镇	+1
灵石	水头镇 索州镇 仁义镇 双池镇 两渡镇 冷泉镇 南关镇 夏门镇 小水镇 石门峪镇	水头镇 索州镇 仁义镇 双池镇 两渡镇 冷泉镇 南关镇 夏门镇 小水镇 石门峪镇 高壁镇 坛镇坡 底镇	+3	
统计数量	前期 170 (个) —— 后期 220 (个) —— 发展： 未见记载 12 个+新增 62 个=实际增加 50 个			

说明：异名同镇的有乔里（李）镇、金店（殿）、故（古）县镇、杨（阳）曲镇、高县（显）镇、隆（龙）化镇、京安（陵）镇、芹（勃）香镇、桃园（源）镇、匠（合）河镇、七级（及）镇、古（故）市镇、薛吉（稽）镇、下任（油杜、牛杜）镇、尉郭（都）镇、张峪（谷）镇、陌底（南）镇、泉掌（长秋）镇、（上下）东镇、大（浚）交镇、禹门（龙门）镇、南关（阴地关）镇、（南北）辛店镇、张村（黑龙关）镇、栲栳（考老）镇、（前后）坛镇、北相（乡）镇、僧念（会僧）镇、乡（卿、坑）头镇、茅津（沙涧）镇、赵伊（东丰）镇、瞿塚（鼓钟）镇等。

表 4-9 清代晋南镇数量密度对照表

府州	前期数量	后期数量	增加数量	前期密度	后期密度	密度倍数
平阳府	58	69	11	4.3	5.1	1.2
蒲州府	27	41	14	7.1	11	1.5
解州直隶州	22	27	5	5.2	6.4	1.2
绛州直隶州	28	39	11	5.2	7.3	1.4
隰州直隶州	23	25	2	3.7	4.0	1.1
霍州直隶州	12	19	7	4.6	7.3	1.6
总计	170	220	50	4.8	6.2	1.3

清代后期晋南未见记载的 12 个镇大多因史料的空缺已经无法证实是否同地理实体一并消亡，亦或仅仅是失掉了镇名，但见于前期方志的记载尚可断定其中曾有 3 个驿镇和 4 个商镇（见表 4-10）。表面上看，虞乡镇和石口子镇两个聚落的镇名亡佚了，查证相关史料，虞乡镇取消了镇名升级为虞乡县，经济功能仍然保存；至于石口子镇，在后期的方志记载中，均统一称石口子（则），其商贸活动也未中断，只是不以镇命名罢了；而另外的郑柴镇和下段镇曾经有过贸易活动，至于在后期的方志中找不见记载是否与其经济功能的丧失有关？从大量承担着商品交换职能的镇仍然活跃于修纂者笔下这一现象，可以肯定的讲，但凡有着经济功能的镇都有着极强的生命力，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延续，倒是那些依靠政府力量兴建的各类型镇，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发生更迭，当其不适应社会发展，极可能沦为地名镇，甚而同镇名一起消亡。除了被剥夺记载入方志的殊荣外，镇的发展还受到其它客观条件的影响，或功能降低、或实体搬迁。最能说明该问题的莫过于“丁戊奇荒”，光绪初年的这场大灾祸对晋南镇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打击，汾西县僧念镇的铺递灾后“仅存其名”，勃香镇、凤头镇、水润镇的市肆荒凉，商业活动大打折扣<sup>①</sup>；张店镇位居南北孔道，“昔时人烟凑集，颇称巨镇，今因灾祸大逊于昔”<sup>②</sup>。清代后期晋南的一些镇还遇到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的重创，如双营镇自黄河东决，散居原上与荣河县接壤<sup>③</sup>。尽管这样，清代后期晋南镇的发展仍以增长的趋势为主流。

在清代后期晋南新增的 62 个镇中，除 37 个镇无法判定类型外，商镇有 10 个，驿镇 8 个，行政镇、商镇驿镇、行政镇驿镇分别有 2 个，军镇 1 个。在新增的商镇中，很多是在村集或具有经济功能的乡村聚落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如临晋县的城西镇和卓里镇，它们前身正是临晋十集中的两处；夏县的尉郭镇以前曾是尉郭集；荣河的后土祠镇原来是当地经常举行庙会的场所。这样看来，除了行政因素

① 光绪《汾西县志》卷 2《城池·铺舍/市镇》。

② 光绪《平陆县续志》卷之上《营建·村堡》。

③ 光绪《河津县志》卷 3《城池·坊里》。

外，一个乡村地理实体是否会升级为镇名与该聚落是否承担经济活动以及承担此项服务的广度与深度密切相关。总的来说，清代后期晋南新增的镇中商贸性质的镇和驿递性质的镇各有 12 个，行政性质的镇 4 个，军事性质的镇仅 1 个。可以看出，商贸性质的镇成为清代后期镇发展的主力，驿递性质的镇增加的数量仍然相当可观，而行政性质的镇增加的数量不多，军事性质的镇为数甚少，它们已经不再代表镇发展的主要特征。这说明，清代后期晋南地区的镇主要体现两方面的势力支持，一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力量下衍生的大量商镇，另一部分仍然是受传统封建政治控制，在国家力量支配下形成的以实现传输为目的的驿镇。尽管商镇在总体数量上占据着明显的优势，有清一代，受内陆闭塞不便，政府势力的干预以及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驿镇始终是晋南地区镇类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 4-10 清代后期晋南镇的演变

亡佚镇	新增镇			
寒门镇	吴村镇(军镇)	盐池镇(行政镇)	广武镇(行政镇)	固镇 坛镇 古镇
长镇 土镇	三林镇(驿镇)	窑子镇(驿镇)	高壁镇(驿镇)	东亢镇 礮山镇 西王镇
王范镇 敬安镇	同善镇(驿镇)	清涧镇(驿镇)	马斗关镇(驿镇)	张家川镇 藺古庄镇 普乐头镇
席张镇(驿镇)	周村镇(驿镇)	北关镇(驿镇)	王黑镇(商镇)	义门镇 店头镇 南关镇 孤南镇
三村镇(驿镇)	瑶渠镇(商镇)	薛店镇(商镇)	卓里镇(商镇)	苏村镇 阳王镇 山云镇 帽阳镇
管村镇(驿镇)	高翁镇(商镇)	皇甫镇(商镇)	响水河镇(商镇)	三泉镇 迎驾镇 对竹镇 香落镇
郑柴镇(商镇)	城西镇(商镇)	唐城镇(商镇)	后土祠镇(商镇)	六郎镇 大阳镇 乾河镇 车城镇
下段镇(商镇)	尉郭镇(商镇驿镇)	东塆底镇(商镇驿镇)		青龙镇 吴城镇 六龙镇 官庄镇
虞乡镇(商镇)	陌底镇(行政镇驿镇)	禹门镇(行政镇驿镇)		玉壁镇 樊村镇 永丰镇 堰掌镇
石口子镇(商镇)				苍头镇 南壇镇 胡壁镇 坡底镇

综上所述，清代晋南地区的镇在类型上可分为单功能镇和多功能镇两种，其中以商贸性质的镇占主体；镇在地理分布上主要集中于谷地、河流两岸、驿路与孔道沿线，军镇一般散布在县界、关隘和渡口。镇在空间分布上以蒲州府境内的密度为最大，而整个晋南地区内镇离县距离的分布情况呈抛物线状态，其中，商业性质的镇密集于 10-40 里的范围；到清代后期，晋南地区未见记载的镇有 12 个，新增加了 62 个，商镇虽在总体数量上占据了明显的优势，但相当数量驿递性质的镇仍不可忽视。

除说明外，本章表格资料来源与第五章同。

## 第五章 清代晋南集会的数量分析

有关我国古代集会的探讨向来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点,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入手,用力颇多。落实到各区域,就山西而言不乏有专家学者对其历史时期的集会进行诸方面的考察。马玉山就曾对明清时期山西市镇的布局与类型进行过宏观探讨<sup>①</sup>;行龙从社会史的角度对近代山西集市的数量、分布及其变迁做过抽样研究<sup>②</sup>;龚关在探讨明清至民国华北集市问题中,对山西也予以了极大的关注<sup>③</sup>;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对晋南市镇的地区分布与时空变化进行了讨论<sup>④</sup>;张青瑶《清代太原盆地镇的发展与周边地域社会经济关系研究》将太原盆地作为考察范围,对该区域内的集镇、村集等经济中心地进行了细致的分析<sup>⑤</sup>。然而,山西地貌破碎,盆地与山区交叉相错,小区域范围内的集会发展仍存在着差异。本章通过对清代晋南集会数量的分析,重点探求不同层级集会间的关系,以期为当前城乡经济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依据。

### 第一节 清代晋南集会的场址数量

本章讨论的集会,包括集市和庙会两个方面。集市按照常规由州县集市、镇集、村集三个层次组成。本章的镇集按习惯统一称集镇,并不是指一切具有商业性质的镇市,而是有“集”的镇,那些也有着贸易活动但在史料记载中明确以“会”的形式从事商品交换的镇被列入庙会的范畴,州县集市与村集也做相同处理。

集会之探讨本可从多方面进行考察,如集会规模、交易大小、个案研究等等,但就实际获取的史料而言,开展上述讨论实属无米之炊,幸而有清一代还保留着有关集会所在地和部分集期的记载,为收集该区域范围内集会的数量提供了难得的凭据。一般而言,集会的数量分为两种,一是集会场址本身的增减,一是同一场址开集频率的升降,即集日的变化,此项直接与该集集期的变化密切相关。统计这一时期集会的数量主要依靠清代和民国各州县所修纂的地方志(约150余部),由于编纂时段不同,体例各异,修纂者的文字水平参差不齐,对集会的记载或详

① 马玉山:《明清时期山西市镇的布局与类型》,《历史地理》,第12辑。

② 行龙:《近代山西集市数量、分布及其变迁》,《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145页;又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③ 龚关:《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集期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④ 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2年;又见《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城镇地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12月。

⑤ 张青瑶:《清代太原盆地镇的发展与周边地域社会经济关系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4年。

略不一，或沿袭前志，甚而空缺，因此，确定某一具体时段对全区进行综合比较尚无可能。有鉴于此，暂将晋南整个清代做为收集信息的时间跨度，将方志中凡承担过经济职能的中心地一并囊括进来，从场址数量剖析晋南集会间的关系。

表 5-1 清代晋南集会场址统计表

县名	集市	庙会
临汾	城内四街；乔村	
洪洞	北关、东关、南关、牛站、小东关、贾家十字、文昌街；郭盆镇、苏堡镇	
浮山	城内四门、东西两街；东张镇、响水河镇	
岳阳	城内；古县镇、府城镇、和川镇、唐城镇；北平村	西池茶房会、南关会辛庄会、并侯茶房会、三台山会、古岳村会、古县镇会、府城镇会、和川镇会
曲沃	顺城关厢、古南关厢、古东关厢、上西门内、古通利坊、小南关神桥、汤王庙前、孝母巷、下西门外；蒙城镇、侯马镇、西庄镇、曲村镇、高县镇、王村镇、东阎镇、下郭镇、隘口镇；交星铺	
翼城	四关厢四市、城内；隆化镇、北常镇、中卫镇、水清镇	
太平	东关、北关、南关、南关北集、本城；古城镇、史村镇、赵康镇；角口、南门外、北柴、膏腴、中黄、永固、北固、相李堡	城内会、北贾坊庙会、北柴泰山沟会、龙王庙会、汾阳庙会、永固庙会、北李庙会、峰坡庙会、姚村会、陈郭会、荀董会、五条斜会、南姚村会、古城会、赵康会
襄陵	南关、北关、东关、城内北市；赵曲镇、京安镇；河头、南辛店、邓庄	
汾西	城内四街；芹香镇、凤头镇、水润镇	县城会
乡宁	东西两街；船窝镇	结义庙庙会、柏山寺庙会、碾东岭庙会、五龙宫庙会、土地庙会、金钟寺庙会、太山庙庙会、分山庙庙会、先皇庙庙会、林山庙庙会
吉州	州市；桃园镇、大度镇、三垢镇、瑶渠镇；冯家碛	本州三会
永济	东关大市、急递铺南北、牛站巷东西、鼓楼下；赵伊镇、考老镇、东张镇、黄龙镇、永乐镇、匡河镇、韩阳镇、高翁镇；小李村、太阳村、焦廬村	五老峰庙会、万固寺庙会、敬祥庙会、陶城庙会
临晋	西关；七级镇、樊桥镇、城西镇、卓里镇、周吴镇、虞乡镇；城子埝、夹马口、角杯、宋家庄	
虞乡	本城；平濠镇、孙常镇、故市镇、卿头镇；虞东屯、东社村、关家庄、	故市庙会
荣河	南北街口；王黑镇、冯村镇、王显镇、孙吉镇、庙前镇、薛稽镇；李庄、谢村、永安营、竹家庄、张村、西李村、程村	后土庙会、三官庙会
猗氏	东关；杜村镇、下任镇	庄武王庙会、城隍庙会、关王庙会、高头里会
万泉	县城四街；解店镇	北关泰山庙会、四望村下生寺、乌苏村峰介寺、太朝村法

		王寺、北张户弥陀寺、汉薛村会、上村会、东文村会、高村会、贾村会、东苏冯会、七庄村会、皇甫镇黄龙寺、东堽底镇法藏寺、解店镇北岳庙会
解州		解州关帝庙
安邑	四关、运城四集；陶村镇；石碑庄、北相寺、北曲、东阳	
夏	学巷口、关王庙前、东街、西街、北街、南关；尉郭镇、水头镇、曹张镇、胡张镇、裴介镇；禹王城、司马村、张郭店、喜安庄	西门外白衣庵会、中留关王庙会、城中后土庙会、鲁因后土庙会、官庄后土庙会、禹王庙会、朱吕泰山庙会、张郭店泰山庙会、堰掌关王庙会、泊头关王庙会、学巷文昌帝君庙会、城隍庙会、西门外准提庵会、南关真武庙会、瑶台会、在城关帝庙会、墙下关帝庙会、胡张真武庙、胡张观音庙
平陆	县城；茅津镇、常乐镇、洪池镇、长店镇、八政镇；中张村	广德会、马村会、车村会、顺头会、胡村会、东关会、张峪会、岳村会、上焦会、留史会、太臣会、阳朝会、中张会、西街会、东掷会、张村会、西侯会、计村会、西张会、阮庙会、洞北会、尧店会、西祁会、西湾会、下郭会、南村会、家窝会、北关会、西掷会、南吴会、南关会、南侯会、茅津会、常乐会、洪池会、张店会、八政会、太宽会、葛赵会
芮城	县城集；陌南镇；晓理村	
垣曲	进贤街、安民街；下王村	
闻喜	南关城、西关城、县治西、北门道十字路口、水西门外；兰德镇、东镇、栗村镇、小郭店镇、宋店镇；裴村	北门外稷庙会、柏林村后稷庙会、西关关帝庙会、卫村关帝庙会、城隍庙会、上东镇四圣庙会、兰德镇后土圣母庙会、下东镇后土圣母庙会、裴村三结义庙会、山底南岳庙会、美阳川寺头村汤王庙会、葛寨村泰岳庙会、小郭店镇泰岳庙会、回坑村泰岳庙会、薛店村泰岳庙会、水池村姜嫄祠会、近瓢五龙庙会、底户头五龙庙会、龙道头龙王庙会
绛	四街、东关；大交镇、横水镇、南樊镇、郑柴镇；吉峪、南柳	
稷山	城关；翟店镇、华峪镇；下庙	管村庙会、西位药王庙会、天地庙会、稷山庙会、疙瘩庙会、娘娘庙会、泰山庙会、八岳庙会、下庙会、阳城庙会、城隍庙会、羲和神庙会、底留史庙会
河津	本城；双营镇、僧楼镇、方平镇、东张镇；楼底村、樊村	
隰州	南北街；水头镇、康城镇、辛庄镇、回龙镇、大麦交镇；均庄、石口子	北门外、西门外三义庙、东岳庙、仵城镇会、义泉镇会、蒿城镇会、水头镇会、回龙镇会、康城镇会、大麦交镇会
大宁	本城	马斗关曹娘娘庙会、龙泉山祖师庙会、火神庙会、翠微山东岳庙会、瘟神庙会、城隍庙会、阿龙庙会、坡角老庙会、吉亭天神庙会、黄家垛龙王庙会、清凉寺庙会等 16 处
蒲	城内三；化乐镇；井沟、克城、乔家湾	
永和		北关镇会、桑壁镇会、永和关镇会、双锁山庙会、楼山二郎庙会、阁山高王庙会、县城老爷庙会、阁山娘娘庙会、望海寺庙会

霍州	城中四街；陈村	
赵城	东关厢、北门、南门、南关厢关外/关内、完璧巷十字路站北/站南；营里堡、安定堡	
灵石	城市；小水镇、仁义镇、双池镇；苏溪、静昇村、峪口村、段纯村、夏门村、梁家疙瘩、道美村	

说明：汾西、乡宁、永济、虞乡、解州、大宁、永和、稷山各州县的庙会场址及芮城、稷山两县集市场址信息来源于1949年后所修方志。

据统计，有清一代，晋南不同州县城镇村集与庙会场址数共460处<sup>①</sup>，其中，平阳府集会场址总数最多，达136处；其次分别为解州直隶州97处、蒲州府82处、绛州直隶州68处、隰州直隶州52处、霍州直隶州25处。各州县集市、集镇、村集、庙会场址数见表5-2。

表5-2 晋南不同州县城镇村集与庙会场址数

	州县集市、集镇、村集、庙会场址数												合计460	
	临汾	洪洞	浮山	岳阳	曲沃	翼城	太平	襄陵	汾西	乡宁	吉州			
平阳府	5	9	8	15	19	9	31	9	8	13	10	11		
													136	
	4 0	7 2	6 2	1 4	9 9	5 4	5 3	4 2	4 3	2 1	1 5	48	35	
	1 0	0 0	0 0	1 9	1 0	0 0	8 15	3 0	0 1	0 10	1 3	15	38	
蒲州府	永济		临晋		虞乡		荣河		猗氏		万泉		6	
	19		11		9		17		7		20		82	
	4 8	3 4	1 6	4 0	1 4	3 1	2 6	7 2	1 2	0 4	4 1	0 15	12 27 17 26	
解州直隶州	解州		安邑		夏		平陆		芮城				5	
	1		13		34		46		3				97	
	0 0	0 1	8 1	4 0	6 5	4 19	1 5	1 39	1 1	1 0	16	12 10 59		
绛州直隶州	绛州		垣曲		闻喜		绛		稷山		河津		6	
	0		3		30		11		17		7		68	
	0 0	0 0	2 0	1 0	5 5	1 19	5 4	2 0	1 2	1 13	1 4	2 0	14 15 7 32	
隰州直隶州	隰州		大宁		蒲		永和						4	
	19		17		7		9						52	
	2 5	2 10	1 0	0 16	3 1	3 0	0 0	0 9	6 6	5 35				
霍州直隶州	霍州			赵城			灵石						3	
	5			9			11						25	
	4 0	1 0	7 0	2 0	1 3	7 0	12 3 10 0							

说明：表格府州第二栏为各地集会场址数；第三栏四个数字从左至右依次代表各地州县集市、集镇、村集与庙会的场址数。

① 实际清代晋南集会场址数要大于此，如绛州在清至民国的方志中并没有记载相关的集会信息，但据李燧《晋游日记》卷1：“绛州城临河，舟楫可达于黄，市廛辐辏，商贾云集”可想而知。

将上表各地州县集市、集镇、村集与庙会进行求和计算，可以得到清代晋南地区集会组成各元素的股份信息：清代晋南地区庙会的场址总数达 190 处，占全部集会场址数的 41.3%；州县集市与集镇的场址数相近，前者略占优势，共 108 处，其比率为 23.5%，后者 98 处，占 21.3%；村集场址数 64，比率为 13.9%。这样，清代晋南地区集会各组成部分从场址数单方面看，大体比分为 4：2：2：1，集镇在场址数上小于庙会和州县集市，但相对村集而言，处于压倒村集赶超州县集市的地位。

表 5-3 清代晋南集会场址数量比率表

	州县集市	集镇	村集	庙会
数量	108	98	64	190
比率	23.5%	21.3%	13.9%	41.3%

为了进一步窥探晋南集会数量间的关系，现以府州为单位分别统计（见表 5-4）。经过测算，在集市场址数上，平阳府以 98 处位列第一，其次为蒲州府 56 处、解州直隶州 38 处、绛州直隶州 36 处、霍州直隶州 25 处、隰州直隶州 17 处；而庙会场址数的排序为解州直隶州 59 处、平阳府 38 处、隰州直隶州 35 处、绛州直隶州 32 处、蒲州府 26 处、霍州直隶州 0 处。上述数字显示，庙会场址多的府州，如解州直隶州、隰州直隶州，集市场址数便相形见拙；集市场址较多的地区，如平阳府、蒲州府，庙会场址数便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绛州直隶州呈现第三种情况：即集市与庙会场址数大体持平的局面。这表明，清代晋南地区的集会在场址数量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但总的来说，除了霍州直隶州以外，庙会的分布在各府州都保持着相当的数量，这是清代晋南地区商业发展中普遍且明显的特点。

表 5-4 清代晋南各府州集会场址数与平均数

	平阳府		蒲州府		解州直隶州		绛州直隶州		隰州直隶州		霍州直隶州	
	集 98	会	集 56	会	集 38	会	集 36	会	集 17	会	集 25	会
数量	48 35 15	38	12 27 17	26	16 12 10	59	14 15 7	32	6 6 5	35	12 3 10	0
平均	8.9	3.5	9.3	4.3	7.6	11.8	6	5.3	4.3	8.8	8.3	0

说明：数量栏从左至右三个数字依次代表州县集市、集镇、村集场址数；平均栏为各府州平均集会数。

通过表 5-4 的相关数据还可以获取到晋南集市内部结构的相关信息。经测算，晋南土地面积 35684 平方公里，集市场址 270，平均每集覆盖面积 132.16 平方公里，平均每集半径 6.5 公里，集市的半径及覆盖面积的相对缩小表明清代晋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超出了全省的平均水平<sup>①</sup>。据行龙研究，近代山西各县除县城集外，县均集市达 5 处，如不计晋北 3 府 17 县，则县均集市达 6 处<sup>②</sup>。刨去庙

① 龚关在《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集期分析》表 3 中统计，清代山西平均每集覆盖面积在 194.31 平方千米，平均每集半径 7.9 千米。

② 行龙：《近代山西集市数量、分布及其变迁》，《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

会和州县集市，清代晋南集市场址数共 162 处，平均每州县集市 4.6 处，看来向称沃土的晋南地区在集市数量上并不达标。若加上州县集市数量再算均值，则每州县集市平均数为 7.71，则超过了全省县均集市数 7.24 的标准<sup>①</sup>，其中，蒲州府、平阳府、霍州直隶州、解州直隶州的县均集市值均高于此。由此看出，清代山西的集镇与村集最密集的区域并不在传统思维理解中的晋南一带，倒是这一片区的州县集市数相对较多。

单强研究，20 世纪初江南地区市镇总数约为 1383 个，平均每千平方公里有市镇 27.8 个；华北冀鲁豫三省在民国时期大约有重要集镇 2248 个，平均每千平方公里有集镇 5.2 个<sup>②</sup>。晋南集镇有 98 个，平均每千平方公里有集镇 7.2 个，交相比较，则清代晋南集镇在密度上只能算同时期江南市镇发展的一个零头，但放在华北片区而言，却是不低于三省的平均值。就镇集密度比较，虽与江南有莫大之差距，但在整个华北来说，并不是发展程度最低的地区。这样看来，清代晋南的县均集市值之所以处于全省中下水平，并非原于州县集市或集镇数量的偏少，而是村集场址数于整个区域中的劣势。

## 第二节 清代晋南集会的集日数量

集会之间的关系单就场址数量进行比较还不够有力，同一场址开集频率的升降，即集日的变化当是更能说明问题的另一个证据。前文已经提到，清代晋南地区所保留下来的方志在记载集期上同样并不详尽，甚至缺乏连续性，姑且将所有与集期相关的信息全部收集整理，进而统计不同层次集会的平均集日和总集日。在资料的录入中，同一场址集期的析列标准取其历史时期集日数量最多的记录。

清代晋南州县集市的集期信息来源于 13 个州县（见表 5-5），集期安排呈现多样化，每日集、隔日集、三日一集、五日一集、六日一集，规格不一。每次集会持续时间少则半天，多至十日，月集日数最高达 30 天，最少 3 天。据统计，下表 34 个场址月集日总数为 300 天，平均场址集日数为 8.8 天。

表 5-5 清代晋南州县集市的集期与集日

县名	场址	集期	集日（月）
浮山	东西两街	三、六、九	18
岳阳	城内集	三、六、九	9
太平	东关集	每月初一日起初六止	6
	南关集	每月二十五日起初三十一日止	7

版社，2002 年 2 月，第 159 页。

① 清至民国山西平均每县集市数 7.24 来源于龚关《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表 7 所列 5 个时期的均值，参见《近代史研究》2001 年第 1 期。

② 单强：《近代江南乡镇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 6 期。

	北关集	每月初七日起初二日止	6
	南关北集	每月初四、十、十六、二十二、二十八	5
安邑	运城四关	各十日轮转	30
平陆	县城	每日清晨集	30
霍州	城中四街	各五日	30
荣河	南北街口	每日早集	60
吉州	州市	三、八	6
灵石	城市	三、六、九	9
猗氏	东关集	五、十	6
隰州	南北街	二、七、五、十	24
赵城	城市北门	一	3
	城市南门	七	3
	完璧巷站北	三	3
	完璧巷站南	五	3
	南关厢关外	七	3
	南关厢关内	九	3
夏	学巷口、关王庙前、东街、西街、北街、南关循环无虚日		30

清代晋南集镇的集期信息来源于 12 个州县（见表 5-6），集期安排则是一旬二集（14 个）、一旬三集（7 个）和一旬五集（6 个）兼而有之，频率最高可至每日，最低的一月举行两次。集会持续时间多为一天，月集日数最少两天，最高为 30 天。统计表明，下表 38 个场址月集日总数为 347 天，平均场址集日数为 9.1 天。

表 5-6 清代晋南集镇的集期与集日

县名	场址	集期	集日（月）
浮山	响水河镇	一、三、五、七、九	15
岳阳	古县镇	二、五、八	9
	府城镇	二、五、八	9
	和川镇	一、四、七	9
	唐城镇	三、六、九	9
太平	古城镇	每月初五、十一、十七、二十三、二十九	5
	史村镇	每月初一、六、十一、十六、二十一、二十六	5
	赵康镇	单日集	15
永济	赵伊镇	二、七	6
	考老镇	四、九	6
	东张镇	三、八	6
	匡河镇	二、五、八	9
	韩阳镇	三、八	6
猗氏	杜村镇	三、六、九	9

	下任镇	二、七	6
夏	尉郭镇	皆六举	3
	水头镇	皆六举	3
	曹张镇	皆十二举	2
	胡张镇	皆十二举	2
	裴介镇	皆十二举	2
平陆	茅津镇	每日集	30
	常乐镇	单日集	15
	洪池镇	双日集	15
	张店镇	月九集	9
隰州	康城镇	一、六	6
	大麦交镇	五、十	6
	辛庄镇	五、十	6
	回龙镇	三、九	6
荣河	薛翟镇	一、六	6
	孙吉镇	三、八	6
	庙前镇	五日一集	6
闻喜	横水镇	一、三、五、八	12
	下东镇	二、四、六、八、十	15
	栗村镇	一、三、六、八	12
蒲	化乐镇	月无闲日	30
灵石	小水镇	四、五、八	9
	仁义镇	一、六	6
	双池镇	一、三、五、七、九	15

清代晋南村集的集期信息来源于7个州县（见表5-7），十日内两至五集不等，频率最高的集期为隔日集，但非具有普遍性，一般多为一旬两至三集。集会持续时间多为一天，月集日数最少5天，最多15天。下表17个场址月集日总数为162天，平均场址集日数为9.5天。

表5-7 清代晋南村集的集期与集日

县名	村集	集期	集日（月）
岳阳	北平村集	三、六、九	9
太平	北柴集	偶日集	15
	膏腴集	每月初三、九、十五、二十一、二十七	5
	中黄集	每月初五、十一、十七、二十三、二十九	5
	永固集	每月初六、十二、十八、二十四、三十	5
永济	小李村集	三、六、九	9

平陆	中张村集	单日集	15
隰州	均庄	三、八	6
	石口子	四、九	6
霍州	陈村	三、六、九	9
灵石	苏溪	一、三、五、七、九	15
	静昇村	三、六、七、九	12
	峪口村	二、四、八	9
	段纯村	一、三、五、七、九	15
	夏门村	一、三、五、七、九	15
	梁家疙瘩	二、八	6
	道美村	二、八	6

如果仅从平均场址集日数看，村集略高，其次为集镇和州县集市。因为方志记载的脱漏，依据所能收集到的部分史料所计算的均值来作为判断清代晋南集市发展的唯一标准显然有失公允，暂将平均集日数设作参数，求取整个清代晋南集市的集日数量。据表 5-8 显示，清代晋南集市月集日总数的排序与前文集会场址数量排序一致，从层级看仍然是州县集市最多，依次是集镇和村集；从县均场址数和最高月集日数看，集镇与州县集市的相关数据差距不大，后者却在集会持续期上具有相当的优势；具有较高平均集日数的村集由于本身场址数的相对偏少致使集市总量偏低。综合场址数和集期频率两方面考察，完全意义上的集市数量排序显示：清代晋南地区集市的叠放如同一个倒置的三角形，而通常集市发育的过程，乃是先有相当多的初级市场，逐渐发展升级为中间市场，进而产生高级市场，发育模式为正立的金字塔。关注清代晋南庙会的发展有助于解释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

表 5-8 清代晋南集市场址数与集日数

	州县集市	集镇	村集		州县集市	集镇	村集
场址总数	108	98	64	县均场址数	3.1	2.8	1.8
平均集日数	8.8	9.1	9.5	最高月集日	30	30	15
月集日总数	950.4	891.8	608	最长持续期	10	1	1

在下表 5-9 中的 11 个州县方志中记载了 136 处庙会，在开设频率上多为一年一次或两三次，最多的达 6 次；每次持续时间一般 1 至 3 天，甚或 13 天；同一场址年集日数少则 1 天，多则达 24 天；在集期安排上一年的每个月都有开设，相对集中于春耕前、秋收后，尤在二月（16 个）、三月（46 个）、四月（25 个）及七月（14 个）、九月（12 个）、十月（25 个）间；庙会的场址位置广布于城镇乡村，其中开设于村镇中的庙会占有绝对数量，不仅如此，越是于镇设立之庙会，集期越频繁，持续时间越长；而广布于村落间的庙会，其年集日数也不可忽视。

康熙《隰州志》中四个集镇（康城、大麦交、辛庄、回龙）以及两个村集（均

庄、石口子)都是具有五日一集的定期市,月集日数36天,除此以外,农村的商品交换活动全部由村镇十处庙会承担,其中七处场址在乡镇(件城镇、义泉镇、蒿城镇、水头镇、康城镇、大麦交镇、回龙镇)。这些在乡镇开设的庙会年频率最低两次,大多在三到四次之间,高的可达六次,像大麦交镇的庙会甚至每月逢二、七、十、十二日举行,频繁到一年有132次。此外,像岳阳县的古县镇、府城镇、古城镇、赵康镇、和川镇和夏县的胡张镇均为集市与庙会交叉相间;平陆县的常乐镇、茅津镇、洪池镇、八政镇集会频繁,而张峪、葛赵两镇的交易活动完全依赖庙会进行;闻喜县的兰德镇、下东镇、小郭店镇以及万泉县的皇甫镇、东塬底镇也是单靠庙会活动来满足当地的消费需求;更有永和县,有清一代,城镇乡村的一切贸易均由北关镇、永和关镇、桑壁镇的庙会来承担。由此可见,集镇之市,凡集期之开设尚且不能满足当地之需,通常会以间歇时间较长的庙会来作为补充,而当一个区域范围的经济程度有限,设立频仍的集市尚不足长期维持其存在时,庙会的产生便有了合理性和必然性,清代晋南的这种集镇与庙会并存或以庙会为主要途径从事商品交换的方式正好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

其实,分布在乡镇的庙会以坐落在各大小村庄为基本特点,在表5-9中可以看出,那些周期较长,持续时间各异的庙会有百余处散布于晋南农村,平均每州县庙会场址数达12.4,庙会数量之多、分布之广似乎有抢占村集市场之嫌。以万全县为例,县内市场层级结构依次为县城集(四街)、集镇(1处)、乡镇庙会(15处),并无一处村集。乡村市场除解店一集镇,无一例外由3个乡镇和12个农村庙会(详见表5-9)组成,其会期已经决然不同于通常之庙会。它们大多数为一旬一会,有的甚至十日两会,其周期轮转的频率已与普通村落之市集别无差异,俨然是集会合一的演变结果。至此足以证明,庙会是清代晋南农村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多、广、散的特点适应着当地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对集镇,尤其是村集起了极大的替代作用,这是导致村集场址数偏少的主要因素,也是清代晋南地区市场层级结构异于它处出现倒三角的客观原因。

表5-9 清代晋南庙会的会期与会日

县名	庙会	会期	会日(年)
岳阳	古县镇会	三月十八;九月十三	2
	府城镇会	六月二十三	1
	城内会	四月十一日起十五日止;十月初五起十二日止	13
	北贾坊庙会	三月二十二日起二十四日止	3
	古城镇会	四月初一日起十一日止;九月十一日起二十三日止	24
	五条斜会	三月初一日起初三日止	3
	赵康镇会	四月初一日起初三日止;八月初一日起初三日止	6
	南姚村会	四月十一日起十三日止	3

	和川镇会	七月二十	1
	西池茶房会	三月二十	1
	南关会	四月初十; 五月十三; 十月初三	3
	辛庄会	四月二十五	1
	并侯茶房会	六月十五	1
	三台山会	七月十八	1
	古岳村会	七月十五	1
太平	北柴泰山沟会	三月十四日起十六日止; 十月十一日起十五日止	8
	龙王庙会	二月初一日起初四日止	4
	汾阳庙会	二月十四日起十六日止	3
	永固庙会	二月二十四日起二十六日止	3
	北李庙会	三月十六日起二十日止	5
	峰坡庙会	三月二十六日起二十九日止; 九月二十四起二十九日止; 十月十八日起二十一日止	14
	姚村会	三月十一日起十三日止; 四月十七日起十九日止	6
	陈郭会	四月二十七日起二十九日止	3
	荀董会	清明节	1
漪氏	庄武王庙会	三月八日	1
	城隍庙会	十月五日	1
	关王庙会	十二月八日	1
	高头里会	正月二十五日	1
万泉	北关泰山庙会	逢五日会	36
	皇甫镇黄龙寺	逢七日会	36
	四望村下生寺	逢九日会	36
	汉薛村会	逢三日会	36
	乌苏村峰介寺	逢四日会	36
	上村会	逢五日会	36
	东文村会	逢一日会	36
	高村会	逢六、十日会	72
	贾村会	逢二、七日会	72
	东苏冯会	逢九日会	36
	东塬底镇法藏寺	逢一、六日会	72
	解店镇北岳庙	逢八日会	36
	太朝村法王寺	逢七日会	36
	七庄村会	逢六日会	36
北张户弥陀寺	逢二日会	36	
夏	西门外白衣庵会	二月初九日; 八月初九日	2
	中留关王庙会	二月二十五日	1
	胡张真武庙会	三月初三日	1
	城中后土庙会	三月十八日	1
	鲁因庙会	三月十八日	1
	官庄庙会	三月十八日	1

	禹王庙会	三月二十二日	1
	朱吕泰山庙会	三月二十五日	1
	张郭店泰山庙会	三月二十八日	1
	堰掌关王庙会	四月初一日	1
	泊头关王庙会	四月初八日	1
	官庄后土庙会	四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	2
	学巷文昌帝君庙会	五月初五日	1
	城隍庙会	六月初六；十二月初八日	2
	西门外准提庵会	七月初七日	1
	南关真武庙会	八月初一日；十一月十五日	2
	瑶台会	八月十五日	1
	胡张观音庵会	九月初九日	1
	在城关帝庙会	九月十三日	1
	墙下关帝庙会	十月初十日	1
平陆	广德会	正月二十日；三月十五日	2
	马村会	二月初二日	1
	车村会	二月初五日	1
	顺头会	十一月初九日；二月初九日	2
	胡村会	二月初九日	1
	东关会	二月十一日；四月十八日；五月二十八日；九月十七日	4
	张峪会	二月十五日；十月十八日；十二月十一日	3
	岳村会	二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	2
	常乐会	三月十九日；十二月初八日；	2
	上焦会	三月初一日	1
	洪池会	三月初三日；十月初十日、十五日	3
	留史会	三月初三日；九月十三日	2
	太臣会	三月初三日	1
	阳朝会	三月初五日	1
	中张会	三月初五日；十二月初五日	2
	茅津会	三月初五日；四月初五日；五月二十五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三十日；十二月十五日	6
	西街会	三月十二日；六月二十二日；十二月十二日	3
	东掷会	三月十三日	1
	张店会	三月十五日；四月十二日；七月初七日；十月十二日	4
	张村会	三月十八日	1
	西侯会	三月二十日	1
	计村会	三月二十五日	1
	西张会	三月二十五日	1
	八政会	三月二十八日；九月十三日	2
	阮庙会	三月二十八日；十月初一日、二十日	3
	涧北会	四月初一日	1
	尧店会	四月初八日	1

	西祁会	四月十四日	1
	西湾会	四月十五日	1
	下郭会	六月初一日	1
	太宽会	七月初十日	1
	南村会	七月十三日	1
	家窝会	七月十五日	1
	北关会	八月十五日	1
	西掷会	九月十三日	1
	葛赵会	十月十五日; 十二月十八日	2
	南吴会	十月二十日	1
	南关会	十月二十二日	1
	南侯会	十月二十五日	1
隰州	件城镇会	正、七、十、二、八、十一月	6
	义泉镇会	二、七、九月	3
	蒿城镇会	正、四、十月	3
	水头镇会	正、八、十一月	3
	康城镇会	正、三、八、十一月	4
	大麦交镇会	逢二、七、十、十二日	132
	北门外	正月、十月	2
	西门外三义庙	五月、十二月	2
	东岳庙	三月二十八日	1
	回龙镇会	正月、十月	2
永和	北关镇会	正、四、七、十、十二月	5
	永和关镇会	三月	1
	桑壁镇会	三、八、九、十	12
闻喜	后稷庙会	四月十七日起, 三日止	3
	柏林村庙会	七月十五日	1
	关帝庙会	五月十三日起, 三日止	3
	卫村会	四月初三日	1
	城隍庙会	九月初九日起, 三日止	3
	四圣庙会	四月十五日	1
	兰德镇后土圣母庙会	三月初十日	1
	下东镇后土圣母庙会	三月十八日	1
	三结义庙会	四月初八日	1
	南岳庙会	二月二十八日	1
	汤王庙会	四月初十日	1
	葛寨村泰岳庙会	三月二十八日	1
	小郭店镇泰岳庙会	三月二十八日	1
	回坑村泰岳庙会	三月二十八日	1
	薛店村泰岳庙会	二月二十五日	1
	姜嫄祠会	六月二十四日	1
	五龙庙会	清明日	1

	龙王庙会	六月六日	1
荣河	后土庙会	三月十八日, 贸易三日	3
	三官庙会	十月十五日, 贸易三日	3
吉州	州会	正、七、十月有三会, 自初八日起至十三日止	18

### 第三节 清代晋南集会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说明不同层级集会之间的变化, 再将各州县不同时段集会的场址数与集日数析列如表, 以动态的眼光审视清代晋南集会的发展, 以窥探其历史演变规律和整体发育程度。

表 5-10 清代晋南集会场址集日统计表

县名	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同治	光绪	民国
临汾		1 0 1 0	0 0 1 0						
洪洞		6 0 0 0	7						
浮山			2 1 0 0 18	2 1 0 0 18			2 1 0 0 18	2 1 0 0 18	2 1 0 0 30 15
岳阳									1 4 1 9 9 36 9 12/12
曲沃		4 9 0 0 1 9 0 0	1 9 0 0	5 8 0 0 7 8 0 0		5 8 0 0		7 8 0 0	
翼城		4 0 0 0	4 0 0 0	2 3 0 0				2 3 0 0	3 2 7 6
太平		0 0 3 0	1 3 1 0 5 6 0 15 0	1 3 3 7 5 26 25 9/36		1 3 3 11 5 26 25 15/61		1 3 4 5 5 16 15 22/100	
襄陵		3 0 1 0	4 2 0 0					4 2 0 0	
汾西		4 0 0 0	4 0 0 0					4 3 0 0	
乡宁	0 2 0 0			0 1 0 0				0 1 0 0	0 1 0 0
吉州		1 0 0 1							
水济		4 4 2 0 7 3 0						4 5 1 0 27 9 0	
临晋		1 7 0 0		1 3 6 0					
虞乡				1 4 3 0					
荣河		2 3 0 2 1 3 2		2 0 4 0				2 2 3 0	
猗氏		1 0 1 3	1 2 0 4 6 15 0 4/4						
万泉		4 1 0 0		4 1 0 0 12					4 0 0 15
安邑		8 0 4 0							
夏		6 4 1 19							
平陆		0 2 0 0 0 3 0 0						1 3 0 39 30 60 0 64/66	

垣曲		2 0 0 0							
闻喜	3 3 0 1 9	2 0 1 0							
绛	5 3 2 0			3 4 0 0				1 3 0 0	
河津		1 3 0 0							
		4 0 0							
隰州		2 4 2 9							
		24 24 12 26							
蒲				3 2 2 0				3 2 2 0	
永和		0 0 0 3							0 0 0 3
霍州		4 0 1 0				4 0 1 0			
						30 0 9 0			
赵城	5 0 0 0	2 0 2 0	2 0 0 0	5 0 0 0		6 0 0 0			
灵石					1 3 6 0	1 3 6 0			1 3 7 0
					9 30 72 0	9 30 72 0			9 30 78 0

说明：表格数字从左至右为州县集市、集镇、村集与庙会场址数，相对应的为各集会的集日数，其中，集市集日数按月计算，庙会集日数按年计算，/前的数字表示年次数；康熙及乾隆年间的场址数据各州县所修方志的时间顺序分作先后两个不同时段；太平县光绪年间集镇和村集中，赵康镇腊月下旬单日集、北柴腊月下旬偶日集均未列入月中计算。

上表 30 个州县的集会信息连续性欠佳，从有限的数据看，各州县集会场址数比较衡一，增减多在 1-2 的范围内波动，最大的幅度也仅限为 4，大多数集市场址呈现内部结构数量的此消彼长的关系。其中，集镇的数量变化情况多样，一则表现出非常缓慢的上升和稳健，如太平县、汾西县、襄陵县、猗氏县、永济县、平陆县；也有长时段停滞不前的现象，如霍州、浮山县、蒲县、永和县、赵城县、灵石县；甚有减少的案例，如曲沃县、乡宁县、临晋县、万泉县、闻喜县，其下降坡度并不大，可视为正常变动；还有绛县、翼城、荣河等县或先升后降，或先跌后涨，各州县情况不一，总的看来其波动幅度相当有限。州县集市和村集场址数的发展情况几同，整体变化甚至不如集镇明显，倒是庙会场址数和集日数的变化非常清晰，由连贯性较好的太平县可窥一斑。从雍正到光绪年间，太平的县城集市、集镇与村集的场址数几乎没有变化，而庙会场址数经历了 0-7-11-5 的演变；考察集日数的升降更能说明问题，县城集市长时期保持每月 5 天的贸易活动。3 个集镇的月集日从 60 天减少为 26 天，直至 16 天，呈现下滑趋势。村集的月集日数虽然有上升的波动，随着庙会的增多又回复到原点。唯有庙会，从无到有，从乾隆时期的一年 9 次 36 个会日发展为道光年间的一年 15 次 61 天，光绪时达到了年 22 次 100 个会日之多。从太平县集会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的看出，集镇与村集的部分市场有被庙会逐渐取代的发展轨迹。

近三百年的时间，清代晋南地区的集市数量变化甚微，既没有出现长足的发展，也不见急剧的下降，集市内部不同层级市场数量的微弱减少，也以增长的庙

会形成补充。那么，清代晋南地区的集会发展程度到底如何？通过同一时期各地集市分布密度的比较，可以明显的看出，山西全省集市的发展程度于华北最低，晋南地区集市的各项指标虽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仍然同其他三省有莫大的差距（参见表 5-11），集市数量整体偏低。于晋南内部而言，平阳府的集市数量最多，但综合其它指标比较，蒲州府的集市发展程度当属最高（参见表 5-12）。如此看来，晋南地区的集市发展属省内中上水平，平阳“大贾甲天下”的认识也只是对州城商贸活动的总结，从府州集市发展全方位衡量，蒲州府理当晋南商品市场最为密集的地区。

表 5-11 清代华北各地集市分布密度表

地区	面积 (平方公里)	集市 数量	集市密度 (/1000 平方公里)	平均每集交易腹 地(平方公里)	平均每集交易 半径(公里)
山东	146736	3139	21.3	46.75	3.9
河南	165141	3031	18.4	54.48	4.2
河北	140253	1861	13.3	75.36	4.9
山西	156419	805	5.1	194.31	7.9
晋南	35684	270	7.6	132.16	6.5

说明：除晋南一栏外，本表数据引自龚关《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集期分析》。

表 5-12 清代晋南区域集市分布密度表

府州	州县	集市	县均集市	人口	面积	集市密度	平均每集		
							交易腹地	交易半径	人口数
平 阳 府	11	98	8.9	766722	13520	7.2	138.04	6.6	7824
蒲 州 府	6	56	9.3	548769	3830	14.6	68.39	4.7	9799
解州直隶州	5	38	7.6	292483	4222	9	111.11	5.9	7697
绛州直隶州	6	36	6	516763	5364	6.7	149.00	6.9	14355
隰州直隶州	4	17	4.3	85771	6146	2.8	361.53	10.7	5045
霍州直隶州	3	25	8.3	176651	2602	9.6	104.08	5.8	7066
合 计	35	270	7.7	2387159	35684	7.6	132.16	6.5	8841

说明：表格中面积单位/平方公里，集市密度为集/1000 平方公里，平均每集交易腹地/平方公里，半径/公里；人口数来源于光绪《山西通志·田赋略》，面积数据以《山西省历史地图集》为蓝本测算。

清代晋南集市数量徘徊不前，发展程度较低，集会数量间的增减制约同该区域自然、人文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是贫瘠而封闭的地理环境。从地质构造上看，临汾、运城属于新生代断陷盆地，汾河沿岸虽稍多沃土，但地狭人满，农田不足且十年九旱，农业生产基础还比较薄弱。农人“终年劳苦，丰年略可自饱，仍不能事父母畜妻子，一遇荒歉流亡殆尽”<sup>①</sup>，农业生产力低下，民艰于生计自然缺乏剩余农产品，也不会有充足的购买能力，进而导致消费市场的疲软。集会的开设除了满足日常油盐柴米的需要外，便是生产资料的交换，鲜少出现主体经济

① 民国《解县志》卷之 3《丁役略》。

作物或手工业经济的拉动，市场贸易处于低层次的交换水平，增建新集遂无必要；另外，相对封闭的盆地内部又多山区和丘陵，境内“舟车不通，商旅罕至，地瘠少获，道险难行”<sup>①</sup>，由于“河道之阻，山径之险，役亦苦矣”<sup>②</sup>，交通运输遂受阻碍。这种四塞之区的面貌得不到改变，则“山环路滞，连陲远都，为四方商贾之所不至，皇华往来之罕由经，是以市面萧寂零落人稀，商人终年顾主，除土著四民外，几无外客问津”<sup>③</sup>。山岭阻隔所致的交通不畅严重制约了交易群体的广泛性和多样性与交易量的上升，集市扩展无力实现。其次，风俗习惯的潜移默化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清代晋商虽名震天下，但在晋南深居山区的各大州县似乎没有影响，广大农村或“男不商贾，女不纺织”<sup>④</sup>，或“男务耕耘，女勤纺绩，不作商贾”<sup>⑤</sup>，诸如蒲县、万泉、大宁、吉县、解县等邑人安土重迁不肯营商，这样外商不易入市，本地居民又不提倡工贾，集会的振兴谈何容易；此外，正是由于僻处万山，土瘠民贫，所谓崇尚简朴的风气普遍存在，农村人口的消费渴望一则是水中月，一则是习以为常，致使消费水平长时期处于低靡状态，频繁开集显然与之不相适应。倒是庙会，以其规模大，分布广、间隔长、与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极为一致的种种优势既满足了当地居民日常的消费需求，同时也丰富了农闲后的娱乐生活，从而逐渐呈现出集会合一的趋势。

综上所述，清代晋南地区的集会发展停滞不前，发育程度较低，集会的数量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集市内部各层次市场间的数量比例失调，州县集市数量相对偏多，集镇与村集数量有限；庙会以多、广、散的分布格局及具有较高频率的会期，对集镇，尤其是村集起了极大的替代作用；有清一代，晋南的集市发展徘徊不前，集会发展纠合并行，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集会发展形式，这与当地的自然、人文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

① 康熙《隰州志》卷之12《户口》。

② 乾隆《蒲县志》卷之2《建置·铺舍》。

③ 民国《浮山县志》卷14《商务·商会》。

④ 乾隆《蒲县志·序》。

⑤ 民国《万泉县志》卷之2《风俗》。

除说明外,本章表格资料均来源于:《嘉庆重修一统志》、《清史稿》、雍正《山西通志》、《山西志辑要》、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平阳府志》、康熙《临汾县志》、雍正《临汾县志》、乾隆《临汾县志》、民国《临汾县志》、雍正《洪洞县志》、民国《洪洞县志》、康熙《浮山县志》、乾隆《浮山县志》、同治《浮山县志》、光绪《浮山县志》、民国《浮山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新修岳阳县志》、康熙《曲沃县志》、乾隆《新修曲沃县志》、乾隆《续修曲沃县志》、道光《新修曲沃县志》、光绪《续修曲沃县志》、民国《新修曲沃县志》、乾隆《翼城县志》、光绪《翼城县志》、民国《翼城县志》、雍正《太平县志》、乾隆《太平县志》、道光《太平县志》、光绪《太平县志》、雍正《襄陵县志》、光绪《襄陵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康熙《汾西县志》、光绪《汾西县志》、顺治《乡宁县志》、康熙《乡宁县志》、乾隆《乡宁县志》、光绪《续修乡宁县志》、民国《乡宁县志》、康熙《吉州志》、光绪《吉州全志》、《吉州乡土志》、康熙《蒲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永济县志》、乾隆《临晋县志》、光绪《续修临晋县志》、民国《临晋县志》、乾隆《虞乡县志》、光绪《虞乡县志》、民国《虞乡县新志》、乾隆《荣河县志》、光绪《荣河县志》、民国《荣河县志》、康熙《猗氏县志》、雍正《猗氏县志》、康熙《万泉县志》、乾隆《万泉县志》、民国《万泉县志》、康熙《解州志》、乾隆《解州志》、民国《解县志》、康熙《安邑县志》、乾隆《解州安邑县志》、康熙《夏县志》、乾隆《解州夏县志》、光绪《夏县志》、康熙《平陆县志》、乾隆《解州平陆县志》、光绪《平陆县续志》、民国《平陆县志》、康熙《芮城县志》、乾隆《解州芮城县志》、民国《芮城县志》、乾隆《直隶绛州州志》、光绪《绛州直隶州志》、民国《新绛县志》、康熙《垣曲县志》、光绪《垣曲县志》、顺治《闻喜县志》、康熙《闻喜县志》、乾隆《闻喜县志》、民国《闻喜县志》、顺治《绛县志》、乾隆《绛县志》、光绪《绛县志》、康熙《稷山县志》、乾隆《稷山县志》、嘉庆《稷山县志》、同治《稷山县志》、康熙《河津县志》、嘉庆《河津县志》、光绪《河津县志》、康熙《隰州志》、光绪《续修隰州志》、康熙《大宁县志》、雍正《大宁县志》、道光《大宁县志》、光绪《大宁县志》、康熙《蒲县新志》、乾隆《蒲县志》、光绪《蒲县续志》、康熙《永和县志》、民国《永和县志》、康熙《鼎修霍州志》、道光《直隶霍州志》、顺治《赵城县志》、乾隆《赵城县志》、道光《赵城县志》、嘉庆《灵石县志》、民国《灵石县志》。

## 第六章 结语

自古至今，山西是黄土高原的典型代表区域，选择清代晋南的镇作为研究对象有助于进一步窥探该区域镇发展的全貌。经过层层讨论，本文提出以下观点：

**镇研究的思考：**在我国古代，由于时空的演变，“镇”的地理表现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而“镇”并不专指商镇，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镇类型的划分可因标准不同而异，判定镇的职能当是研究的第一步。在具体操作中，拓展镇为经济型镇级中心地和非经济型镇聚落将有利于解决研究中的实际问题；在界定商镇属性时，应避免以点代面，以量变代替质变的倾向，鼓励加强镇与乡村关系的研究，这是实现镇研究新突破的重要途径。

**清代晋南村镇关系：**清代晋南地区的村镇关系体现在方志的记载思想中：镇隶属于乡里，却又处处显示出优越性来。从镇的历史演变分析，镇来源于前代的军事关镇，或在普通的村庄堡寨基础上自发形成，即使存在部分由官方扶植而形成的镇也始终以村落固有的形式发展延续。然而，镇在人口和规模上却远远超过了普通村落，所承担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功能奠定了镇乡土中央性的地位。简言之，镇虽囿于乡村的范畴，却实际为乡村聚落的中心地。

**清代晋南“镇”概况：**清代晋南的镇在类型上主要为单功能镇，也有部分多功能镇，而商贸性质的镇占主体；镇在地理分布上主要集中于谷地、河流两岸、驿路与孔道沿线，在空间分布上以蒲州府境内的镇分布密度为最大，而整个晋南地区内镇离（州）县城距离的分布情况呈抛物线状态，其中，商业性质的镇密集于距（州）县城 10-40 里的范围；到清代后期，晋南地区未见记载的镇有 12 个，新增加了 62 个，仍以商贸性质的镇和驿递性质的镇为主。

**清代晋南集会关系：**清代晋南地区的集会发展停滞不前，发育程度较低，集会的数量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集市内部各层次市场间的数量比例失调，州县集市数量偏多，集镇与村集数量有限；庙会以多、广、散的分布格局及具有较高频率的会期，对集镇，尤其是村集起了极大的替代作用；有清一代，晋南的集市发展徘徊不前，集会发展纠合并行，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集会发展形式，这与当地的自然、人文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

## 参考文献

### (一) 历史文献

- [1] (清) 潘赐恩纂:《嘉庆重修一统志》,上海商务,1934年。
- [2] 赵尔巽:《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 [3] (清) 乾隆官修:《清朝文献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
- [4] (清) 乾隆官修:《续文献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
- [5] 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
- [6] 台湾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明清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 [7] 沈云龙选辑:《明清史料汇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1973年。
- [8] (清) 李燧、李宏龄著,黄鉴晖校注:《晋游日记·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
- [9] (清) 觉罗石麟修,储大文纂:雍正《山西通志》,清雍正十二年刻本。
- [10] (清) 雅德修,汪本直纂:《山西志辑要》,清乾隆四十五年刻本。
- [11] (清) 王轩等纂,高可、刘英编:光绪《山西通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
- [12] (清) 刘荣修,孔尚任纂:康熙《平阳府志》,清康熙四十七年刻本。
- [13] (清) 章廷珪修,范安治纂:雍正《平阳府志》,清乾隆元年刻本。
- [14] (明) 邢云路原本,(清) 林弘化续纂修:康熙《临汾县志》,清康熙十二年增刻明万历本。
- [15] (清) 官懋言纂修:康熙《临汾县志》,清康熙五十七年刻本。
- [16] (清) 徐三俊修,陈献可纂:雍正《临汾县志》,清雍正八年刻本。
- [17] (清) 高塘、吴士淳修,吕淙、吴克云纂:乾隆《临汾县志》,清乾隆四十四刻本。
- [18] 刘玉玠、关世熙修,张其昌等纂:民国《临汾县志》,民国二十二年铅印本。
- [19] (清) 余世堂修,董维等纂:雍正《洪洞县志》,清雍正九年刻本。
- [20] 孙奂仑、贺椿寿修,韩垌纂:民国《洪洞县志》,民国五年铅印本。
- [21] (清) 潘廷侯修,秦绍襄纂:康熙《浮山县志》,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 [22] (清) 贾酉、张乾元修,张华、皇甫奎纂:乾隆《浮山县志》,清乾隆十年刻本。
- [23] (清) 庆钟纂修:同治《浮山县志》,清同治十三年刻本。
- [24] (清) 鹿学典等修,武克明等纂:光绪《浮山县志》,清光绪六年刻本。
- [25] (清) 任耀先修,乔本情、张桂书等纂:民国《浮山县志》,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 [26] (清) 赵温修, 常逊等纂: 雍正《岳阳县志》, 清雍正十三年刻本。
- [27] 李钟珩, 王之哲纂: 民国《新修岳阳县志》, 民国四年石印本。
- [28] (清) 潘锦修, 仇翊道纂: 康熙《曲沃县志》, 清康熙四十四年刻本。
- [29] (清) 张坊修, 胡元琢、徐储纂: 乾隆《新修曲沃县志》, 清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 [30] (清) 侯长煊修, 王安恭纂: 乾隆《续修曲沃县志》, 清嘉庆二年刻本。
- [31] (清) 张兆衡纂修: 道光《新修曲沃县志》, 清道光二十二年刻本。
- [32] (清) 张鸿逵、茅丕熙修, 韩之泰纂: 光绪《续修曲沃县志》, 清光绪六年刻本。
- [33] 邬汉章修, 仇汝功纂: 民国《新修曲沃县志》, 民国十七年铅印本。
- [34] (清) 李居颐纂修: 乾隆《翼城县志》, 清乾隆二年刻本。
- [35] (清) 许崇楷纂修: 乾隆《翼城县志》, 清乾隆三十六年刻本。
- [36] (清) 王耀章, 龚履坦纂修: 光绪《翼城县志》, 清光绪七年刻本。
- [37] 马继桢修, 吉廷彦编纂: 民国《翼城县志》, 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 [38] (清) 刘崇元修, 张枚等纂: 雍正《太平县志》, 清雍正三年刻本。
- [39] (清) 张钟秀修, 周令德等纂: 乾隆《太平县志》, 清乾隆四十年刻本。
- [40] (清) 李炳彦修, 梁棲鸾纂: 道光《太平县志》清道光五年刻本。
- [41] (清) 劳文庆、朱光绶修, 娄道南纂: 光绪《太平县志》, 清光绪八年刻本。
- [42] (清) 赵懋本修, 卢秉纯纂: 雍正《襄陵县志》, 清雍正十年年刻本。
- [43] (清) 钱墉修, 郝登云纂: 光绪《襄陵县志》, 清光绪七年刻本。
- [44] 李世佑修, 刘师亮纂: 民国《襄陵县新志》, 民国十二年刻本。
- [45] (清) 蒋鸣龙修, 傅南宮纂: 康熙《汾西县志》, 清康熙十三年刻本。
- [46] (清) 曹宪修, 周凤纂: 光绪《汾西县志》, 清光绪七年刻本。
- [47] (明) 焦守己纂修, (清) 侯世爵续纂修: 顺治《乡宁县志》, 国家图书馆分馆编《清代孤本方志选》第2辑第8册, 北京: 线装书局, 2001年。
- [48] (清) 张聊箕纂修: 康熙《乡宁县志》, 清康熙十一年刻本。
- [49] (清) 葛清纂修: 乾隆《乡宁县志》, 清乾隆四十九年刻本。
- [50] (清) 冯安澜修, 崔钟淦纂: 光绪《续修乡宁县志》, 清光绪七年刻本。
- [51] 赵祖抃修, 吴庚、赵意空纂: 民国《乡宁县志》, 民国六年刻本。
- [52] (清) 南鹏修, 曹执衡纂: 康熙《吉州志》, 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 [53] (清) 吴葵之修, 裴国苞纂: 光绪《吉州全志》, 民国间铅印本。
- [54] 国家图书馆分馆编: 《吉州乡土志》, 《乡土志抄本选编》第5册, 北京: 线装书局, 2002年。
- [55] (清) 侯康民修, 贾潏纂: 康熙《蒲州府志》, 清康熙九年刻本。
- [56] (清) 周景柱纂修: 乾隆《蒲州府志》, 清乾隆十九年刻本。

- [57] (清)李荣和、刘钟麟修,张元懋纂:光绪《永济县志》,清光绪十二年刻本。
- [58] (清)王正茂纂修:乾隆《临晋县志》,清乾隆三十八年刻本。
- [59] (清)艾绍濂、吴曾荣修,姚东济纂:光绪《续修临晋县志》,清光绪六年刻本。
- [60] 俞家骥、许鑑觀修,赵意空、于廷梁纂:民国《临晋县志》,民国十二年铅印本。
- [61] (清)周大儒修,尚云章等纂:乾隆《虞乡县志》,清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 [62] (清)崔铸善修,陈鼎隆、全谋馐纂:光绪《虞乡县志》,清光绪十二年刻本。
- [63] 徐贯之、周振声修,李无逸等纂:民国《虞乡县新志》,民国九年石印本。
- [64] (清)杨令琢纂修:乾隆《荣河县志》,清乾隆三十四年刻本。
- [65] (清)马鉴、王希濂修,寻奎炜纂:光绪《荣河县志》,清光绪七年刻本。
- [66] 张柳星、范茂松修,郭廷瑞纂:民国《荣河县志》,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 [67] (清)陈一魁修,衛既齐纂:康熙《猗氏县志》,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 [68] (清)潘钺修,吴启元、高绍烈纂,宋之树续修,何世勳、陈偶仪续纂:雍正《猗氏县志》,清雍正七年续修刻本。
- [69] (清)周之桢修,崔曾颐纂:同治《猗氏县志》,清同治六年刻本。
- [70] (清)徐浩修,潘梦龙纂:光绪《续猗氏县志》,清光绪六年刻本。
- [71] (清)瞿亮邦纂修:康熙《万泉县志》,清康熙四十七年刻本。
- [72] (清)毕宿焘修,张史笔纂:乾隆《万泉县志》,清乾隆二十三年刻本。
- [73] 何燊、程瑶階修,冯文瑞、王景命纂:民国《万泉县志》,民国七年石印本。
- [74] (清)陈士性修,马淑援纂:康熙《解州志》,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 [75] (清)言如泗等纂修:乾隆《解州志》,清乾隆二十九年刻本。
- [76] (清)马丕瑶、魏象乾修,张承熊纂:光绪《解州志》,清光绪七年刻本。
- [77] 徐嘉清修,曲迺锐纂:民国《解县志》,民国九年石印本。
- [78] (清)赵增纂修:康熙《安邑县志》,清康熙十年刻本。
- [79] (清)赵辅堂修,张承熊纂:光绪《安邑县续志》,清光绪六年刻本。
- [80] (清)言如泗修,熊名相、吕灃等纂:乾隆《解州安邑县运城志》,清乾隆二十九年刻《解州全志》本。
- [81] (清)言如泗修,吕灃、郑必扬纂:乾隆《解州安邑县志》,清乾隆二十九年刻《解州全志》本。
- [82] (清)言如泗修,李遵唐纂:乾隆《解州夏县志》,清乾隆二十九年刻《解州全志》本。
- [83] (清)蒋起龙纂修:康熙《夏县志》,清康熙四十七年刻本。
- [84] (清)黄缙荣、万启钧修,张承熊纂:光绪《夏县志》,清光绪六年刻本。
- [85] (清)柴应辰纂修,潘钺增纂:康熙《平陆县志》,清康熙十八年刻,五十

二年增刻本。

- [86] (清)言如泗、韩夔典修，杜若拙、荆如棠纂：乾隆《解州平陆县志》，清乾隆二十九年刻《解州全志》本。
- [87] (清)刘鸿逵修，沉承恩纂：光绪《平陆县续志》，清光绪六年刻本。
- [88] (清)言如泗总修，韩夔典纂修：民国《平陆县志》，民国二十一年石印本。
- [89] (清)毕盛赞修，王舜民纂：康熙《芮城县志》，清乾隆二十九年刻《解州全志》本。
- [90] (清)言如泗修，莫溥纂：乾隆《解州芮城县志》，清乾隆二十九年刻《解州全志》本。
- [91] 牛照藻修，萧光汉纂：民国《芮城县志》，民国十二年铅印本。
- [92] (清)张成德修，李友洙等纂：乾隆《直隶绛州志》，清乾隆三十年刻本。
- [93] (清)李焕扬修，张于铸纂：光绪《绛州直隶州志》，清光绪五年刻本。
- [94] 徐昭俭修，杨兆泰纂：民国《新绛县志》，民国十八年铅印本。
- [95] (清)纪宏谟修，马佐纂：康熙《垣曲县志》，清康熙十一年刻本。
- [96] (清)薛无钊修，张于铸纂：光绪《垣曲县志》，清光绪五年刻本。
- [97] (清)苏本眉修，王体言纂：顺治《闻喜县志》，清顺治十年刻本。
- [98] (清)沈光瑀修，杨永宁纂：康熙《闻喜县志》，清康熙十一年刻本。
- [99] (清)李遵唐纂修：乾隆《闻喜县志》，清乾隆三十一年刻本。
- [100] (清)陈作哲修，杨深秀纂：光绪《闻喜县志斟》，清光绪六年刻本。
- [101] (清)陈作哲修，杨深秀纂：光绪《闻喜县志补》，清光绪六年刻本。
- [102] (清)陈作哲修，杨深秀纂：光绪《闻喜县志续》，清光绪六年刻本。
- [103] 余宝滋修，杨赅田纂：民国《闻喜县志》，民国七年石印本。
- [104] (清)赵士弘修，陈所性纂：顺治《绛县志》，清顺治十六年刻本。
- [105] (清)拉昌阿修，王本智纂：乾隆《绛县志》，清乾隆三十年刻本。
- [106] (清)胡廷纂修：光绪《绛县志》，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 [107] (清)顾涑初纂修：康熙《稷山县志》，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 [108] (清)韦之瑗修，郭珮等纂：乾隆《稷山县志》，清乾隆三十年刻本。
- [109] (清)张应辰修，王墀等纂：嘉庆《稷山县志》，清嘉庆二十年刻本。
- [110] (清)沈凤翔修，邓嘉绅纂：同治《稷山县志》，清同治四年刻本。
- [111] (清)马家鼎纂修：光绪《续修稷山县志》，清光绪十一年刻本。
- [112] (清)马光远修，刘梁嵩纂：康熙《河津县志》，清康熙十一年刻本。
- [113] (清)沈千鑑修，王政、牛述贤纂：嘉庆《河津县志》，清嘉庆二十年刻本。
- [114] (清)茅丕熙、杨汉章修，程象濂、韩秉钧纂：光绪《河津县志》，清光绪

六年刻本。

- [115] (清) 钱以塏纂修：康熙《隰州志》，康熙四十九年刻本。
- [116] (清) 崔澄寰修，王嘉会纂：光绪《续修隰州志》，清光绪二十四年刻本。
- [117] (清) 刘芳永修，曹续祖纂：康熙《大宁县志》，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
- [118] (清) 杜瑾修，刘源涑纂：雍正《大宁县志》，清雍正八年刻本。
- [119] (清) 杜棠修，郭屏纂：道光《大宁县志》，清道光二十四年刻本。
- [120] (清) 崔同絨修，李华棠纂：光绪《大宁县志》，清光绪九年刻本。
- [121] (清) 胡必蕃修，贺友范纂：康熙《蒲县新志》，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 [122] (清) 巫慧修，王居正纂：乾隆《蒲县志》，清乾隆十八年刻本。
- [123] (清) 托克托欢修，曹和均、罗良桂纂：光绪《蒲县续志》，清光绪六年刻本。
- [124] (清) 王士仪纂修：康熙《永和县志》，清康熙四十九年刻本。
- [125] 阎佩礼修，段金成纂：民国《永和县志》，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 [126] (清) 黄复生修，黄翊圣纂：康熙《鼎修霍州志》，清康熙十二年刻本。
- [127] (清) 崔允昭修，李培谦纂：道光《直隶霍州志》，清道光六年刻本。
- [128] (清) 杨立旭修，白天章纂：光绪《续刻直隶霍州志》，清光绪六年刻本。
- [129] (清) 安锡祚修，刘复鼎纂：顺治《赵城县志》，清顺治十六年刻本。
- [130] (清) 李升階纂修：乾隆《赵城县志》，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 [131] (清) 杨廷亮纂修：道光《赵城县志》，清道光七年刻本。
- [132] (清) 王志融修，黄宪成纂：嘉庆《灵石县志》，嘉庆二十二年刻本。
- [133] 李凯朋修，耿步蟾纂：民国《灵石县志》，民国二十三年铅印本。
- [134] 河津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河津市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 [135] 临汾市志编纂委员会编：《临汾市志》，北京：海潮出版社，2002年。
- [136] 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运城市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94年。
- [137] 浮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浮山县志》，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 [138] 大宁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大宁县志》，北京：海潮出版社，1990年。
- [139] 乡宁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乡宁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年。
- [140] 蒲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蒲县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 [141] 山西省翼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翼城县志》，北京：海潮出版社，1997年。
- [142] 永和县志征编领导组：《永和县志》，北京：学苑出版社，1999年。
- [143] 曲沃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曲沃县志》，北京：海潮出版社，1991年。
- [144] 汾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汾西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年。
- [145] 芮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芮城县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

- [146] 临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临猗县志》，北京：海潮出版社，1993年。
- [147] 平陆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平陆县志》，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2年。
- [148] 新绛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新绛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 [149] 万荣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万荣县志》，北京：海潮出版社，1995年。
- [150] 绛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绛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 [151] 山西省灵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灵石县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2年。
- [152] 闻喜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闻喜县志》，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3年。
- [153] 稷山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稷山县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年。
- [154] 永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永济县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 [155] 垣曲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垣曲县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 [156] 吉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吉县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 (二) 今人论著

### (1) 著作

- [1] 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
- [2] 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
- [3] 刘景纯：《清代黄土高原城镇地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 [4]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
- [5] 樊树志：《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 [6] 龙登高：《江南市场史——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 [7] 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
- [8] 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 [9] 费孝通：《走出江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
- [10] 邹兵：《小城镇的制度变迁与政策分析》，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年。
- [11] 李学勤、许吉军主编：《长江文化史》，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 [12] 高有鹏：《中国庙会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
- [13] 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
- [14]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 [15]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 [16] 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
- [17] (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 [18] (美)施坚雅主编，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 [19] 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3年。

- [20] 张萍：《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明清陕西区域市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 (2) 论文

- [1] 任放：《二十世纪明清市镇经济研究》，《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 [2] 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类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
- [3] 颜晓红、方致远：《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明清城镇及城乡商品经济研究的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4期。
- [4] 吴滔：《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研究概说》，《中国农史》2005年第2期。
- [5] 月泉：《2004年明清经济史研究述评》，《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
- [6] 钟兴永：《近十年中国集市贸易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4期。
- [7] 张家炎：《十年来两湖地区暨江汉平原明清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1期。
- [8] 林荣琴：《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11期。
- [9] 张青瑶、王社教：《清代中后期太原盆地镇的类型及形成因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
- [10] 王社教：《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体系和规模演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
- [11] 张青瑶：《清代太原盆地镇的发展与周边地域社会经济关系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4年。
- [12] 刘景纯：《从地志资料看清代黄土高原地区市镇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4期。
- [13] 张萍：《黄土高原原梁区商业集镇的发展及地域结构分析——以清代宜川县为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期。
- [14] 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民族研究》2003年第6期。
- [15] 张萍：《明清陕西商路建设与市场分布格局》，陕师大西北环发中心编：《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2004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 [16] 张萍：《明清陕西庙会市场研究》，《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 [17] 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成熟形态的探讨——江南地区市场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10期。
- [18] 龙登高：《近年来封建市场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9期。
- [19] 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的整合：11——19世纪的历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 [20] 龙登高：《论个体小农与传统市场——以宋代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 [21] 张彬树：《明清市场经济发展的困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 [22] 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
- [23] 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 [24] 赵冈：《论中国历史上的市镇》，《中国社会经济研究史》1992年第2期。
- [25] 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
- [26] 邓亦兵：《清代前期的市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
- [27] 何荣昌：《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发展》，《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 [28] 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 [29] 傅宗文：《宋代的草市镇》，《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
- [30] 小田：《近代江南庙会经济管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 [31] 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年1月号。
- [32] 郭正忠：《中国古代城市经济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光明日报》1985年7月24日。
- [33] 郭正忠：《城郭·市场·中小城镇》，《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
- [34] 陈国灿：《南宋太湖流域市镇的人口规模与居民结构》，《许昌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 [35] 陈学文：《古代江南发达地区嘉兴市镇经济及其结构的探索》，《探索》1986年第4期。
- [36] 陈学文：《明清时期湖州府市镇经济的发展》，《浙江学刊》1989年第4期。
- [37] 陈学文：《略论明中叶市镇经济的发展》，《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
- [38] 王瑞成：《近世转型时期的城市化——中国城市史学基本问题初探》，《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 [39] 范毅军：《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2年第3期。
- [40] 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 [41] 行龙、张万寿：《近代山西集市数量、分布及其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 [42] 马玉山：《明清时期山西市镇的布局与类型》，《历史地理》，第12辑。
- [43] 龚关：《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
- [44] 龚关：《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集期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 致 谢

三年来，中心是树，宿舍是家，蜷寐于树的庇护，徜徉在家的温暖，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竟弹指一挥间。在青春的这条小河里，流淌的不仅是生活中的落寞孤寂和欢声笑语，更有求学路上的辗转反侧和柳暗花明。千万人之中，我的导师、中心所有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的良师益友，以及 108 舍的姐妹，没有您们，天空再美我也只是断翅的鸟儿，大海再蓝，我也找不到翱翔的勇气。有了您们，我便获得了一个特殊的走廊，能从这个走廊迈向生命中的任何一个地方！

一川烟草，满城飞絮，愁情荡漾，酸楚难平，应是离别时，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感恩的心将珍藏着这份隽永，直至时间将我挫骨扬灰！

熊梅

2007 年 4 月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1] 熊梅、王社教：《历史时期我国北方地区村镇关系初探——以清代晋南方志为中心》，《中国地方志》（录用）。
- [2] 熊梅：《唐诗中的乡村生活》，《古今农业》，2006年第2期。
- [3] 熊梅：《南宋利州路分合考论》，《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2期。
- [4] 熊梅：《论“天府之国”的兴替》，《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 [5] 熊梅：《南宋利州路分合初考》，《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 [6] 熊梅：《川渝“偷”俗的形成与演变》，《巴蜀史志》，2005年第5期。
- [7] 2006年参与《清史·生态环境志》资料长编课题组的资料查询与整理工作。